政治科學論叢／第 83 期／民國 109 年 3 月／頁 55-100

伊拉克的「衝突韌性」分析：2018 年國會選舉、庫區議會選舉與宗派主義的影響*

王順文**

摘　要

伊拉克的衝突情形有許多的面向，包括政府的失能、嚴重的貪腐，甚至包括宗派的對立等問題。但研究焦點多在「制度」面上探討重建的成敗，較少著眼於領導菁英的角色。「衝突韌性」的概念即是強調「和平建立」的過程應該投資在「由下而上」的建制上，以因應可能的衝突，並探討實地處理系統性危機的在地行爲者如何從「建制」、「過程能力」與「結果」等三個層次來化解衝突。

因此，本文將分爲四個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分將針對伊拉克的衝突根源與衝突韌性概念進行文獻回顧，並探討關於衝突韌性的相關文獻。第二個部分則主要探討 2018 年伊拉克國會選舉後的衝突韌性，第三個部分主要探討 2017 年庫區政府獨立公投後與中央政府之間，以及 2018 年庫區議會選後組建內閣的衝突與妥協過程，宗派主義也在伊拉克的衝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什葉派的朝聖活動「阿巴音節」（Arba'een Pilgrimage）所代表的是由宗教團體與地方政府協力，達到預防衝突與暴力並成功的案例，因此，本文將探討阿巴音節的解決衝

* DOI:10.6166/TJPS.202003_(83).0002
本文接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107-2410-H-034-024），並感謝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之指正意見。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E-mail: wsw4@ulive.pccu.edu.tw。
收稿日期：108 年 10 月 28 日；通過日期：109 年 3 月 27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突機制，並探討宗派主義與衝突韌性間的關聯性。最後，本文將根據衝突韌性概念下的建制、過程與結果層面，來分析伊拉克的衝突形式與結果，並作出結論。

關鍵詞：衝突韌性、2018 年伊拉克國會選舉、2018 年庫區議會選舉、阿巴音節、宗派主義、庫區獨立公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2019 年的 10 月，伊拉克各地爆發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抗爭行動與衝突，什葉派爲主的抗議者訴求政府應徹底改變，並認爲包括貪污、無能、宗派主義影響、伊斯蘭主義與伊朗的滲透，已經使政府失去其應有的正當性。但相對的，伊拉克政府並沒有理會抗議者的需求，採取強力的鎮壓，造成了數百人死亡、約 2 萬多人受傷的衝突情勢（Hannah, 2020），亦造成了前總理馬赫迪（Adil Abdul Mahdi）的下台與現任總理阿拉維（Mohammed Tawfik Allawi）的繼任。[1]

事實上，早在前總理馬利基（Nuri al Maliki）執政的時期，反貪腐與反宗派治理的抗爭就已開始升高，只是早期的執政者多半將問題推向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對立。2011 年 2 月，示威者在首都巴格達（Baghdad）、摩蘇爾（Mosul）、巴斯拉省（Basra）等地發動「憤怒之日」（Day of Rage）的抗爭行動，引發暴力衝突與多人死亡（The Telegraph, 2011），不過，該抗爭還沒有反對政府，只是訴求公共服務提升與就業。2013 年抗爭行動也在安巴爾省（Anbar）展開，示威者抗議什葉派領導的中央政府不斷將遜尼派邊緣化，同時抗議中央政府在反恐行動上分配不均以及隨意逮捕遜尼派等。但當時的馬利基總理的做法卻是企圖逮捕遜尼派的政治人物，也是前任副總統哈希米（Tarek al-Hashimi）等人（BBC, 2013），此舉引發了伊拉克北部許多地區的抗爭，也導致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因此掌握許多北部的城市。

不過，從 2013 年開始，大規模的抗爭與改革的呼籲開始在伊拉克全境展開。2015 年 8 月，缺電的問題引發抗爭行動，雖然過去政府都可將抗爭的矛頭指向遜尼派與蓋達組織的影響，但是 2015 年的抗爭者幾乎是什葉派，抗爭地區也非原本的北部，而是巴格達與南部，時任總理的阿巴迪（Haider al-Abadi）承諾改革，可是群眾仍對象徵性改革表達不滿，直到 2018 年國

[1] 阿拉維在反對意見下宣布退出總理委任，後於 2020 年 4 月 9 日伊拉克國家情報局局長哈德米（Mustafa al-Kadhimi）獲總統薩利赫（Barham Salih）任命爲總理。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選舉過程期間，南部省份如巴斯拉仍有大規模抗議（Alaaldin, 2018）。[2]

而除了 2019 年大規模的衝突之外，美軍在 2020 年 1 月於巴格達刺殺伊朗「聖城軍」（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與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Hashd al-Shaabi*,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3] 的指揮官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的行動，也讓伊拉克的情勢更加複雜。如原本反對政府的示威遊行，也轉移成反對美國的遊行，甚至，有些反伊朗的聲音因此受到打壓，也使得目前伊拉克的情勢更加難以處理（Magid, 2020）。內部的團體間也產生更大的分歧，如國會最大黨領袖薩德爾（Muqtada al-Sadr）所領導的「藍帽」（Blue Hats）[4] 原本是支持反政府的公共示威活動，但是在 2020 年 1 月美國的刺殺事件之後，薩德爾決定將藍帽撤出示威活動，引起許多團體反彈，後又因爲許多示威者並不支持薩德爾於 2020 年 1 月 24 日舉行的反美百萬人大遊行，且示威者試圖封鎖道路以防止各省的薩德爾支持者進入巴格達，又加上納迦夫（Najaf）市與巴格達皆發生藍帽成員襲擊示威人士的事件（Zeed, 2020），更使得團體間矛盾加劇。

伊拉克的衝突情勢一直是學術界許多文獻探討的重點，究竟伊拉克衝突的根源爲何？或者如何才能夠提供伊拉克一個解決衝突、並達致和平的

---

2 巴斯拉省爲伊拉克最大的石油存量區域，佔了 80% 的石油出口，每個月可以提供 70 億美元的收益，但是卻是最窮的省份之一，缺水、電與工作，使當地民失去希望。再者，政府的效能仍是受限，有許多的區域並非政府所能完全掌控的，如什葉派的南部區域，有許多區域就受到民兵、部落甚至是宗派團體的控制。

3 人民動員力量主要是爲了對抗伊斯蘭國而於 2014 年集合伊拉克民兵團體成立，並集合了包括法雅德（Falih al-Fayyadh）、阿梅里（Hadi Al-Amiri）、薩德爾等不同的民兵團體與領袖，由於美國在 2019 年便警告伊拉克，若巴格達無法控制這些民兵，美國將會有所反應，因此，馬赫迪總理於 2019 年 7 月，宣布將人民動員收編入安全部隊，受國防部管轄。但這項政策並沒有得到落實，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的民兵有「穿著伊拉克安全部隊制服、使用美國武器，卻效忠伊朗」的狀況（Glob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2020）。此次被美軍刺殺是的穆罕迪斯與蘇雷曼尼便是長期合作的關係，穆罕迪斯爲眞主黨旅（Kataib Hizb Allah）的領導人，其雖然爲伊拉克的國會議員，但是卻多數時間在伊朗，並隸屬在聖城軍之下（Knights, 2010: 12-13）。

4 亦即在遊行過程中，有組織的頭戴藍色帽子參與遊行，如 Zeed (2020) 報導中，即有藍帽成員的相關圖片與介紹。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制？其實，造成伊拉克的衝突情勢有許多的原因，包括政府的失能、嚴重的貪腐，甚至包括宗派的對立等問題，而在何種情況下較容易化解哪些衝突？「衝突韌性」（conflict resilience）的相關著作，[5] 即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衝突韌性」主要指涉失敗國家在和平建立的過程中，如何建立抵抗混亂的能力或恢復力，特別是在制度面、過程面與結果面，如何「避免暴力的發生」。此概念來自於和平建立（peacebuilding）的概念，Naazneeen Barma 等人認爲和平建立的核心在於了解和平的深度（depth of peace）（Barma et al., 2017: 188）。而所謂和平的深度，即在測量該社會發展其韌性的程度，也就是如何處理衝突與避免大規模的暴力（Barma et al., 2017: 195）。和平建立的過程中通常有三個面向：第一、「暴力的消失」：也就是所謂的「負面的和平」（negative peace），希望能夠做到在各個層級上，達到暴力的消失，不論是組織與日常的暴力；第二、「衝突後的恢復」：重點在於衝突後的社會如何能夠正常化，包括社會的療育過程與族群之間和平關係的重建；第三則是「衝突韌性」：所涉及的則是社會如何藉由機制解決衝突，並避免

---

[5] 韌性（resilience）一詞在許多學術領域被廣泛探討，包括心理學、生態學、工程學、政治學、和平與衝突研究等等，心理學上對於韌性的研究面向非常廣泛，包括臨床上心裡的韌性如何形成。比方說有許多文章提到像病患面對癌症、學生面對升學或網路成癮等不同議題上的調適，甚至亦有從社會支持面的角度出發，探討韌性對於個體行爲者的影響。在生態學領域，則主要區分爲工程韌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生態韌性（ecological resilience）與社會生態韌性（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也就是面對擾動，如何透過效率的提升，以減少復原的時間（工程韌性），組織相互協調、利用資源，以達到新的平衡（生態韌性），以及透過組織的學習、多樣性與創造力的培養，促成系統組織的重組與再生（社會生態韌性）此三個面向（黃泰霖，2012：7）。
韌性的概念運用到社會科學，主要焦點放在「抵抗混亂的能力」，也就是「系統化解危害威脅的能力」，同時，也關心哪些背後力量造成系統的脆弱（黃泰霖，2012：2）。在政治學門以韌性作爲研究對象則以公共行政領域居多，特別是與城市的防災與治理結合而成的「韌性城市」相關的研究，既然災害無法避免，更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增加承災能力與恢復能力。其他有些著作是從制度的層次探討，比方說陳淳文從制度韌性的角度出發，並結合政治系統論的概念，將政治事件視爲是外在的衝擊，而將違憲審查制度視爲是回應的內建機制，以探討半總統制的存續以及制度韌性與調適（2017：3）。李宗勳（2017）探討社區協力策略在大量傷患事件緊急救護中的系統韌性，亦是從制度層次出發。有些文章則探討韌性的過程面與結果面，如李宗勳（2015）探討災防的韌性治理與風險分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發成全面性的暴力（Barma et al., 2017: 196）。

衝突韌性的概念，其實是反映過去對於和平建立較強調階段管理與或如民主和平建立（liberal peacebuilding）所說的，藉由外在的、民主的機制來促進重建失敗的反思，[6] 同時，衝突韌性的概念也與和平建立中的「保持和平」（sustaining peace）[7] 相結合，從外在干預者的角度轉至實地處理系統性危機的在地行爲者（如政府、社會、組織與個人）（Juncos, 2018: 562）。因此，強調和平建立的過程須投資在「由下而上」（bottom-up）的建制，以因應可能的衝突，而對於外在干預者來說，了解當地的複雜度（包括歷史、社會經濟結構等），才能有助於協助當地形成具備韌性的機制，而非如同過去失敗的「由上而下」將外來的制度直接套用（De Coning, 2016；Juncos, 2018: 559）。也因此，在研究上傾向於依案例探討，藉由案例的比較，分析衝突的形式、成因以及衝突是否得以解決的方式與機制。

本文探討的伊拉克衝突韌性案例即在此脈絡下進行。全文將分爲 4 個部分：第一部分將針對伊拉克的衝突根源與衝突韌性概念進行文獻回顧，並探討關於衝突韌性的相關文獻。第二部分則首先將探討伊拉克中央政府所面臨的困境與衝突解決的方式，分別探討伊拉克國會選舉與組建政府的過程，探討政治菁英之間的衝突與妥協方案，進而探討伊拉克的衝突點與可能解決途徑。

第三部分主要探討地方的庫區政府解決衝突的過程，主要分析庫區政府獨立公投與組建內閣的衝突與妥協過程，特別是庫區內部的衝突情勢，

---

6 如聯合國的網站上也引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話：「建設和平、保持和平這項工作不僅需要在衝突爆發後開展，而且需要在衝突爆發前很長時間裡，以預防衝突、消除根源的形式開展（聯合國，2020），也意味著聯合國在衝突管理上，並不僅僅是「後衝突時期爲了維持長期和平局勢，結合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道考量，透過制度的建立，建立國家得以永續發展的基礎」（林佾靜，2008：148）。

7 在聯合國中文資料中將 peacebuilding 翻譯成「建設和平」，而將 sustaining peace 翻譯成「保持和平」，惟臺灣多述文獻多將 peacebuilding 翻譯成「建立和平」或「和平建立」，本文則沿採「和平建立」的翻譯方式。但「保持和平」則較無固定翻譯，雖有「持久和平」或「永續和平」的翻譯方式，但爲避免與許多中國大陸文章中的「持久和平」（lasting peace）相衝突，因而採取聯合國中文資料翻譯。2018 年 1 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報告中，並以和平建立與保持和平作爲主題，強調聯合國與當地社群的參與，爲保持和平工作的一部分，亦即強調「在地化」的重要性（聯合國，2018：15）。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極大多數的民眾在公投中支持庫德獨立卻面臨中央政府的封鎖時，內部的政治人物如何採取措施，建立信任與管理衝突，是研究的核心問題。同時，2018 年亦是庫區政府的選舉年，在選後的領導階層之間，如何逐步化解衝突，組建政府，亦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最後，宗派主義（sectarianism）[8] 在伊拉克的衝突中扮演何種角色，也是值得觀察的重點。其中什葉派的朝聖活動「阿巴音節」（Arba'een Pilgrimage）[9] 所代表的是由宗教團體與地方政府協力，達到預防衝突與暴力並成功的案例。因此，本文將探討阿巴音節的解決衝突機制，並探討宗派主義與衝突韌性間的關聯性。上述的 3 個案例，將有助於從中央、地方乃至宗教活動中的衝突形式與解決衝突的途徑中，探索其解決衝突的途徑，並分析其不同的衝突樣態。

貳、伊拉克衝突根源與衝突韌性

一、伊拉克的衝突根源

伊拉克的衝突根源非常複雜，除了長期以來存在的遜尼派與什葉派，以及阿拉伯裔與庫德裔，甚至是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乃至於治理與宗派主義的問題等，都包含在內。以下則簡述幾個伊拉克的主要衝突根源，

---

8 在先知穆罕默德於西元 632 年過世後，對於穆斯林的教義就開始分爲遜尼派（Sunnis，意味著傳統與共識）與什葉（Shia，意即阿里的黨人，阿里爲穆罕默德的女婿）。而從早期的領導人與正當性之爭，也引發了之後 1400 年的分隔。不過宗派上的分隔是否爲現今中東混亂的主因，則亦有學者提出質疑，如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同爲遜尼派的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就有不同的立場。因此，所謂的宗派主義，可能並非是根植在一般民眾的內心，而是「獨裁者試圖使用古老的宗教認同觀，並達到致命的政治化（lethally politicized）」，以達到控制的效果（Hashemi & Postel, 2017: 21）。因此，本文在指涉宗派主義時，則希望單純探討宗教行動是否會造成衝突與動亂，並有助於與政治上的衝突比較。

9 阿巴音節爲什葉派的重要節日，每年在阿舒拉（Ashura）後第 40 日開始，主要是紀念什葉派所尊崇的伊瑪目胡笙阿里（Imman Hussein Ali，穆罕默德之孫）在卡爾巴拉（Karbala）戰死。每年有數百萬至近千萬的什葉派信眾，從納迦夫開始步行並聚集在卡爾巴拉，進行年度的宗教朝聖之旅，這麼多人的聚會，特別是都是什葉派的信徒，過去常常是恐怖攻擊的標的，比方說 2016 年 11 月的自殺式汽車炸彈攻擊便是一例（Peterson,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包括：(一) 長期的歷史與傳統影響，(二) 宗教與宗派領袖的影響，(三) 外在行爲者的影響與治理的失敗。

(一) 伊拉克的歷史與傳統

現代的伊拉克經歷了 4 個階段，包括立憲君主階段（1920～1958 年）、軍事威權統治階段（1958～1968 年）、海珊（Saddam Hussein）所統治的「阿拉伯復興黨」（Ba'ath）統治階段（1968～2003 年）以及後海珊的時代（2003 年以後）（Nazir, 2006: 47）。伊拉克的建立一開始就是英國「人爲製造」的政治產品，這種人工合成的結果，就是民眾保留各自不同的效忠對象（汪波，2007：156），英國當年決定讓庫德族爲主體的摩蘇爾依附於阿拉伯人統治的巴格達和巴斯拉，以避免伊拉克成爲一個強大的國家，必須透過國家的枷鎖來控制這個支離破碎和充滿暴力的社會（Dodge, 2003: 158-159）。

在軍事政權主導與阿拉伯復興黨的階段，統治者進一步地削弱什葉派與庫德族的勢力，1958 年開始，伊拉克政府透過對石油的獨立控制，獲取大量利益，從而採取加強國家安全機構，以控制不同的族群，進而避免國家的分裂（Nazir, 2006）。整體而言，現代的伊拉克歷史其實就是由阿拉伯裔、庫德裔與土庫曼裔以及宗教的什葉派與遜尼派衝突的結果，只是早期以派系爲主，並沒有明確的分隔什葉派與遜尼派，而後期因爲遜尼派的長期掌控，什葉派在無法取得政治權力之下，導致了 1980 年代的出走潮，或者將精力放在商業、貿易與農業（Nazir, 2006: 55），除此之外，也還有庫德族一直想要自治或獨立的問題。

在美國出兵與干預之後，一開始希望透過聯邦主義的方式，促使當地菁英能夠養成協調的文化，但關於什葉與遜尼、庫德的權力分配，始終沒有良好的解決途徑，甚至庫德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二) 宗教與宗派領袖的影響

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對抗的衝突雖然因爲前述不同階段而有不同形式，但也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於政府失能的結果，根據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指出，對失敗國家的民眾來說，所謂的和平，就是「擁有工作」與像電力這種基礎設施的提供，但這些部分卻常常受到腐敗的政客、警察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資料庫

或派閥所控制，[10] 也因此宗派的領導人與組織反而比政府更能夠扮演安定者或協助者的角色（Guttieri & Piombo, 2007: 46；Maley, 2013: 38-40）。

特別是什葉派「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希斯塔尼（Ali al-Sistani）和其在納迦夫的宗教中心亦扮演重要的角色。[11] 比方說希斯塔尼在美國主導的聯盟行政當局過程中，便多次對選舉的方式有重要的影響力（王順文，2018：161；Dobbins et al., 2009: 287-289）。另外，伊斯蘭的教法（*sharia*）也是在規劃憲法上成爲主要的討論因素。不過，雖然在宗教的角度上，希斯塔尼對於伊拉克人有深切影響力，不過研究也指出伊拉克人對於宗教介入政治相對保留，雖然伊拉克人表達對現有政權的不滿，但是對於伊拉克政府的主權與存在則是高度支持，且並不同意遜尼與庫德族的自治（Christia et al., 2016: 4）。[12]

(三) 外在行爲者與治理的失敗

外來的干預者，特別是美國與伊朗，也影響著伊拉克的情勢發展，而內部的行爲者謀求利益的過程，則導致了治理的進一步失敗。王順文（2018）在分析美國在主導「聯盟行政當局」（CPA）時期的作爲時作出下列結論：「伊拉克的情勢先受到干預者的規範層次與國家利益考量、被干預國在體

---

[10] 在筆者的訪談中，受訪者便指出，哈金家族（al-Hakim）在納迦夫一地就至少有 60 間的旅館，這些既得利益者仍會傾向維持其利益，因此反對勢力如何能形成，將是一個問題。

[11] 希斯塔尼是什葉派最高宗教權威（marja）。除了希斯塔尼以外，納迦夫領導中心亦有另外三位大阿亞圖拉，與希斯塔尼一同被稱爲「四大領袖」（Big Four），分別是：哈金（Muhammad Said al-Hakim）、納賈菲（Bashir al-Najafi）與法雅德（Muhammad al Fayadh），但四大阿亞圖拉雖然有重要的角色，但基本上並不涉入政治（Hamoudi, 2009）。

[12] Fotini Christia 等人（Christia et al.,2016）藉由阿巴音節的訪談與問卷統計資料，分析參與阿巴音節的宗教什葉派人士之政治態度與行爲，並從下列幾個面向做出結論：首先是媒體、新聞與社會連帶關係方面，超過 75% 伊拉克人民從 TV 取得訊息，60% 從朋友與家人，第二個資訊來源則是來自於清眞寺，另外，半數的伊拉克人每月至少數次使用網際網路，最常用的就是 Skype, Whatsapp, Viber。在宗派主義的立場上，當直接問及宗教時，伊拉克人民會支持遜尼與什葉的對話，但認爲兩者間在伊斯蘭對於暴力的詮釋上有所差異。但是，當自己有家人或朋友受到遜尼派傷害時，呈現的是雖然支持互動關係，但個人並不支持。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系中的地位、周邊行爲者與當地行爲者對於重建措施的立場，進而才是制度上的問題，如治理與正當性等做法上。而從美國的大戰略來看，聯盟行政當局時期的相關作法並沒有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大戰略的發展，因此不能完全說聯盟行政當局的重建是失敗的，但是如果單純從制度的面向來看，則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另外，伊拉克的案例中更有周邊行爲者如伊朗的介入，使得情勢更加複雜（王順文，2018：167-168）。

但是，該文也發現，伊拉克政治菁英的立場確實影響了重建的成效。比方說在什葉派流亡政治人物利用「去阿拉伯復興黨委員會」打擊異己與安插職位、希斯塔尼的影響力、遜尼派對失去權力的擔憂，以及庫德族對於自治甚至是獨立的盤算等，都在選舉制度的討論、憲法的制訂以及石油的利益分配等扮演角色，也影響重建的成效（王順文，2018：167-168）。由此可以看出，分析政治菁英的立場，亦將有助於了解和平建立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模糊性（ambiguity）與複雜性（complexity）的問題，而這也是「衝突韌性」成爲近期歐盟與聯合國在和平建立措施上的主要標的，從傳統的外在制度的管理，轉向針對脆弱國家的內在行爲者如何以最佳的方式來解決危機，是一種「以人爲中心」（people-centered）與在地化（local turn）的和平建立手段（Ejdus & Juncos, 2018；Juncos, 2018: 562）。

二、衝突韌性與和平建立

在失敗國家中，因爲仇恨、恐懼、憤怒等因素仍然深植在人心，使得衝突隨時有可能會再度發生（Lonergan, 2017: 5），因此，從制度層次與人際互動層次尋求和解顯得困難。過去和平建立相關研究中，便已探討負面與正面的和平（negative and positive peace），所謂的「負面和平」，是指避免積極的武裝衝突的情況，而「正面和平」則是包括了經濟與社會福利，甚至包括文化的認同，它所指涉的除了是物質上的安全，也包括結構設計如何給予當地民眾增能、參與以及問責等功能（Guttieri et al., 2007: 40）。衝突韌性則與正面和平接近，強調強化失敗國家對抗風險，並能成功處理的能力，避免衝突的升高。伴隨著人們認知的改變，包括如何看待自己與他者、群體行爲方式以及社群的改變，逐步走向和平。但衝突韌性注意到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決策者的層次、不同的階段以及相關網絡的設定（貿易網絡、社會網絡等）（Carpenter, 2014: 5）。

傳統上，和平建立的論述多著重在制度層次，也就是提昇政府治理的能力，[13] 但是，如何能夠讓這些失敗國家變得更有韌性以抵抗未來的衝突，則是學者進一步關心的問題（Krasner & Risse, 2014: 545-567）。Raimo Väyrynen 則認爲其階段應包含衝突預防、避免升高情勢、以及後衝突的預防（Väyrynen, 1997）。Naazneeen Barma 等人認爲應從社會的層次出發，以了解避免衝突發生的機制（Barma et al., 2017: 196），而相關的機制也會因不同的國家與部門而有所差異，更重要的是如何「由下而上」解決在地的問題。

(一) 因國家與部門而有所不同

從許多和平建立的案例中，可以發現有些國家透過政權的轉移或和平協議的存在，即促進民主與穩定；[14] 有些國家雖有相關的機制，但是公民的權利卻沒有顯著的進展；[15] 最後，有些則是空有制度，但是在缺乏民主傳統、環境因素與外在行爲者的政策困境下，導致無法達成和平（Guttieri & Piombo, 2007: 41）。[16]

同時，達成和平的過程也會因爲次級區域、時間、公共服務提供的部門與種類而有所不同（Barma et al., 2017: 196），社會系統吸收、調適與修

---

[13] 和平建立的內涵很廣，因此常常發生概念混用的狀況（如國家重建、和平建立、治理等），不過大致上仍著重制度層次居多，包括：建立民主制度、重建社會和諧關係、權力共享制度安排、降低社會經濟不均、提倡法治概念、改善安全部門及促進教育等。同時，結合聯合國在和平上的努力，和平建立的具體項目則包括：辦理選舉、建立賦稅制度、推動社區教育計畫、促進不同族群宗教團體間交流機會等，盼透過制度面向，健全國家與社會體制，徹底根除衝突源頭（林佾靜，2009：126-137），也就是正當性的政治（legitimate politics），同時亦包括安全、正義、經濟組織以及利益分配（revenues）與服務（Gisselquist, 2015: 284），但也更與自由與民主的重建與治理結合在一起，具備政治、經濟與社會目標的干預戰略，甚至是一種「藉由治理所導致的和平」（Barma et al., 2017: 191）。

[14] 如那米比亞（Namibia）、莫三比克（Mozambique）、南非（South Africa）或東帝汶（East Timor）。

[15] 如柬埔寨（Cambodia）、波士尼亞（Bosnia）與科索沃（Kosovo）。

[16] 如阿富汗（Afghanistan）、伊拉克（Iraq）、巴勒斯坦（Palestine）等。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期刊資料庫

復壓力的方式，未必涉及到國家的機制，比方說經濟上的緊張關係可以透過市場或國家協調的機制解決，社會的緊張關係可以透過公民社會、制度甚至是當地的非正式機制解決。就如同 Kingdon (2003) 所提出的政策櫥窗，外來的援助者可以在「問題流」與「政策流」上提出貢獻，給當地的決策者參考，但是否要直接地參與當地的「政治流」，則常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Gisselquist, 2015: 297），而「政治流」往往是政策窗能否形成的核心，也因此本文亦將分析焦點放在在地行爲者面對衝突，如何匯集相關意見的過程。

(二) 在地的問題如何解決

在地的脈絡（local context），特別是政策窗的形成，常常需要在地的行爲者配合（Gisselquist, 2015: 294），至於在地的問題如何進行研究，Ami C. Carpenter (2012) 爲較完整探討衝突韌性的學者，她將衝突韌性本質，分爲三個類別，包括：政治與社會結構、領導者與社群組織以及經濟與地理空間的基礎設施（2012：187）。在政治與社會結構面向，主要是社群內部包括規範、社會組織、網絡與政治體系所產生的影響力，著重於解釋內部的（內生的）治理制度，並強調組織之間交互作用、民主規範與相關的實踐（Carpenter, 2014: 7）。

在領導與社群組織的面向，主要的目標在於領導者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如信任的建立、認同的形成、衝突的管理等），以及相關社群面對威脅的自我組織能力，此處關心的是社群如何能夠自我調節以避免衝突，而宗教與社群的領導者在此就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爲他們可以藉由他們的話語，強調寬容或共存，以強化社會的整體性，而所謂的組織（如清眞寺、教堂、和平組織等）也是讓人們在危機中可以協調的重要場域（Carpenter, 2014: 7）。

在經濟與地理空間的基礎設施的面向上，主要指涉相關建制對於外在因素，也就是影響衝突的行爲者之標的物，如石油管線、機場、學校等等，或者交通設施與貿易網絡等的維繫能力（Carpenter, 2012: 188），透過主要標的物的控制，可以增強相關社群在此地區的治理能力，因此，也會對韌性的形成產生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rpenter (2014)[17] 並建議從「建制」（regimes）、「過程能力」（process capacities）與「特定結果」（outcomes）來進行研究，[18] 但如前所述，因爲這些面向同時受到政治與社會結構、領導與社群組織以及經濟與空間的基礎設施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主要放在領導者與社群的角色，並探討其對於建制、過程與結果的影響，而放到本文的案例上，也因爲研究伊拉克的問題上已有許多文章探討政治與社會結構以及基礎設施的層面，[19] 但較

---

17 她在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Sectarian Violence in Baghdad* 一書中，從衝突韌性的角度，探討巴格達周邊的城市或社群，如何抵抗宗派的暴力，並利用深度訪談的方式，佐以歷史、觀點與經驗的蒐集，以驗證衝突的成因與成功達成韌性的方式。不過，該作者爲美國籍的女性學者，因此，在考量實地訪談的危險性情況下，她是透過委託當地的 YouGove LLC 的訪員進行訪談，進而做出結論，本文則主要以文獻分析並佐以赴伊拉克實地訪談爲主。

18 建制指當地社群的結構，過程能力則是指和平建立過程如何避免使用宗派的意識形態，並避免形成宗派式的民兵組織或讓民兵進入社群，而特定結果則是辨明如傷害、暴力等形式的降低、經濟的破壞、組織間的衝突以及當地法治的建立與維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辨別何時及以及衝突韌性會以何種方式形成（Carpenter, 2014: 7）。

19 本文以伊拉克的衝突韌性作爲標的，但重點並不打算放在政治與社會結構與基礎設施的層面，因爲相關的文章已經有很多且有第一手的研究資料，比方說由 James Dobbins 等人（Dobbins et al.,2009）所編的 *Occupying Iraq A History of 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一書，指出了伊拉克在重建過程在政治與社會結構中，以及在基礎設施的重建效能上不足之處，包括美國官員的軍文協調不足、貪腐的問題無法解決、重建的成果不如預期等面向。

另外，在 SIGIR (2013) 的報告 *Learning from Iraq* 一文中，也針對伊拉克官員、美國的重建官員與美國國會議員有深度的訪談，並呈現當地官員與美國官員對於相關規範、政治體系的問題以及重建的效能等問題的不同認知。英國的齊爾考特報告（*The Chilcot Report*）也放在所謂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面向，該報告完整的整理英國的戰略發展、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武器與國際干預行動與衝突後重建的各項安排與資源運用，在衝突後的重建等部分，其著重於相關文獻的分析，比方說當時的英國情報單位認爲衝突的來源可能來自美國所推動的「去阿拉伯復興黨」無差別性的排除原屬於海珊政權的官員（Chilcot, 2016）。

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USIP）及其它非政府組織在伊拉克的和平重建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 Tikrit 等地的重建爲例，都顯示出在當地層次也可以找到衝突韌性與衝突解決的模式。比方說在 Tikrit 地區的重建，由非政府組織 Sanad for Peacebuilding 所協調當地遜尼派與什葉派所簽訂的 2015 和平協定，就爲當地市場、商業、學校、醫院等重新建立，建立了機制，並且使得超過 38 萬的伊拉克人民回到家鄉（Lindborg, 2017），此類型的案例顯示出由下而上創造衝突韌性的可能性，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圖書館

少著眼於領導菁英之間的角色，因此，本文將研究焦點著重於此，除結合報章雜誌有關領導菁英的言論之外，並結合庫區實地訪談加以驗證相關文獻，[20]以下將探討不同案例中的衝突形式與解決衝突的方式。

參、2018 年伊拉克國會選舉與組建政府的衝突

一、政府職位的分配與民眾期望的落差

伊拉克於 2018 年 5 月的國會選舉的結果並沒有展現修復其內部的宗派衝突、貪污與不穩定的情勢，相反的走向更糟的情況。[21] 由於民眾對政治失望，導致投票率只有 44.5%，而前總理阿巴迪曾率領伊拉克打敗了伊斯蘭國並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其所領導的「勝利聯盟」（*al-Nasr*）卻只拿到第三名（42 席），公眾也質疑選舉舞弊，導致幾個選區重新計票，並造成新政府延後數月才成立。

新政府確認了伊拉克總統薩利赫與總理馬赫迪的統治階層，此兩位都

如同 USIP 中東部門負責人 Sarhang Hamasaeed 所說的，若從巴格達簽訂和平協議，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但是如果由下而上，將更能夠考量到部族之間的規範，而且也能夠有效的補償受害者並建立當地的安全，甚至有助於達成全國性的協議（Strasser, 2017）。

[20] 本文作者在科技部計畫的資助下，曾透過當地臺商湛聿晃先生協助下，於伊拉克庫德自治區的首府艾比爾（Erbil）訪談包括庫德斯坦大學（University of Kurdistan）區域與國際研究中心執行長 Hayman Hussein Mirkhan 博士（曾任庫德區獨立公投時期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Ano Jawhar Abdoka（現任庫區運輸與通訊部長）、KDP 宗教事務負責人等人，同時，亦曾訪談位於土耳其安卡拉的「中東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RSAM）研究員 Bilgay Duman 等人。

[21] 選舉結果由什葉派薩德爾領導的「前進聯盟」（*Sairun*, Forward）（54 席）、什葉派阿梅里所領導的「征服黨」（*al-Fatah*, Conquest Alliance）獲得 48 席、前總理阿巴迪所領導的「勝利聯盟」（*Al-Nasr*, Victory Alliance）獲得 42 席、庫德族的「庫德斯坦民主黨」（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KDP）獲得 25 席、馬利基所領導的「法治聯盟」（*Dawlat al-Qanun*, State of Law）獲得 25 席、前副總統亞拉威（Ayad Allawi）所領導的「民族聯盟」（*Al-Wataniya*, National Coalition）獲得 21 席、哈金（Ammar al-Hakim）所領導的「民族智慧趨勢黨」（*al-Hikma*, National Wisdom Trend）獲得 19 席，庫區第二大黨「庫德愛國聯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 PUK）獲得 18 席與努貫菲（Osama al-Nujaifi）領導的「伊拉克決定聯盟」（*Qarar*, Decision）獲得 14 席等爲主要政黨（CIA, 2019）。

臺灣人

是技術官僚與改革者的代表人物，但是並沒有改變選後什葉派的各方勢力分食政府職位的結果，並因此陷入了政府職位分配的延宕。其主要的爭執點就是在於是否要沿用過去的依照政黨分配的制度，過去伊拉克有「權力分享機制」（亦即 *Muhasasa taifa*）[22] 的分配默契，也就是 2005 年開始，希望能夠給予不同的族群參與政府的機會，並尋求和平的承諾，但是事實上政府的職位基本上是由政黨黨魁決定，且多數的職位是基於宗派與種族的認同（Dodge, 2018）。

選舉之後，對於專業人士組閣的期待獲得包括宗教領袖與國會最大黨的支持。如四大阿亞圖拉之一的納賈菲（Bashir al-Najafi）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聲明表示希望新的內閣能夠結束民眾的苦難並解決公共服務的相關問題。馬赫迪總理主張內閣能走向專業化，而非如同過去採取政黨立場的推薦，他認爲由政黨推薦就會只在乎政黨的利益，而不顧全國的利益（Albawaba, 2018）。同時，最大黨的領導人薩德爾也支持這樣的看法，不過他主要訴求的對象爲庫區領導人，他指出「我們知道你們之間有些人是溫和的，且基於虔誠（piety）與愛國主義並不想要區分庫德裔與阿拉伯裔」，因此訴求庫德族放棄「分配制度」（quota system）[23]（Middle East Monitor, 2018）。

但遜尼派、庫德族與什葉派間的爭議，仍使伊拉克國會無法通過所有部長的任命，而其中更以國防部長與內政部長爲爭執的重點。2018 年 10 月 24 日共有 14 位部長宣誓就任，其他 8 位部長則仍在爭端當中，特別是內政部長候選人法雅德（Falih Fayadh）爲「人民動員力量」主席，也爲前任

---

[22] Muhasasa 這個詞來自於阿拉伯文的「任命」，taifa 則是「宗派」或「教派」的含義，Muhasasa taifa 依據種族與宗派的「分配制度」（quota system）被用來作爲分配內閣席次的方式（Dodge, 2018）。

[23] 所謂的分配制度主要就是在聯盟行政當局時期就留下來的不成文規定，引入聯邦主義與權力分享的概念，希望平衡阿拉伯裔與庫德裔、宗教與世俗、流亡者與內部成員等（Dobbins et al., 2009: 45），而此不成文的規定所造成的傳統就是由庫德裔擔任伊拉克總統、什葉派擔任總理、遜尼派擔任國會議長的角色，但是很多人則認爲此種分配制度會影響到伊拉克的民主，因爲領導人士根據宗派與種族，而非功績（merit）。過去在阿巴迪總理與其對手前總理馬利基便已經討論過。馬利基、哈金與遜尼派的努賈菲都曾反對此制度，而過去薩德爾與阿巴迪則是支持分配制度（Habib, 2018），不過較爲不同的是薩德爾已經改變其立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府的國安顧問，因此遭到最大黨「前進黨」（*Sayirun*, Forward）反對該項任命，認爲任命不應該爲一黨之私，而應該找到專業的人才，因此產生僵局（Rudaw, 2018b）。遜尼派的「決定聯盟」亦表示新任政府並沒有遵守權力分享的機制與他們協商，而僅聽從政府發言人、同樣也是遜尼派的哈爾布斯（Mohammed al-Halbousi）的意見，因此在 10 月決定退出組閣談判（Reuters, 2018）。

同時，人民的不滿仍舊持續，2018 年 7 月，大型的示威又在伊拉克南部的巴斯拉爆發，並持續兩個月，不僅僅在南部多省份，更擴及到巴格達，此次的示威不僅僅在範圍、持續時間與造成傷亡人數都是近年來最嚴重的，光 7 月就有 14 個人死亡與數百人受傷，之後 9 月又有 12 個人死亡（Bengio, 2018），[24] 示威者封鎖道路，並控制納迦夫機場，甚至對巴斯拉機場發射火箭，也對市政府、政治立場較傾伊朗「人民動員力量」民兵總部縱火，焚燬伊朗領導人的相片，甚至攻擊伊朗在巴斯拉的代表處。雖然說這可以視爲是對於伊朗切斷電力，導致在高溫 48 度下的伊拉克群眾群情激憤，但是，也表示什葉派統治下的政府不能使什葉派的民眾感到滿意，不僅經濟、社會與安全情勢都在惡化，貪腐更爲民眾所不滿。抗議者認爲伊拉克的問題是政治與宗教菁英所造成的，甚至說這些人「以宗教之名的小偷對我們搶劫」（Bengio, 2018）。

2018 年 11 月，在南部巴斯拉又因爲水污染的問題造成 12 萬人受到影響，並引發瘧疾，再度導致抗爭的發生，根據報導，除了公共服務提供的問題引起抗爭外，民眾也主張反對極權的統治，並要求教育、就業等權利，更認爲伊朗介入巴格達的政治事務太深（Aldroubi, 2018a）。

在眾多混亂因素下，中央政府直到 2019 年 6 月才終於確定幾個重要且爭議中的部長，國防部長由薩姆馬里（Najah Hassan al-Shamari）擔任，內政部長由亞西禮（Yassin al-Yasiri）擔任，而司法部長則由施汪尼（Farouq Amin Shwani）擔任，亞西禮爲國際法學者，並由民族智慧趨勢黨的哈金（Ammar al-Hakim）[25] 所支持，國防部長薩姆馬里爲軍方出身的技術官僚，

[24] 不過 2019 年 10 月爆發出更大規模的衝突與死傷。

[25] 哈金爲伊拉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 ISCI）領袖，2017 年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爲遜尼派的阿拉伯裔，並由民族聯盟的阿亞德阿拉維（Ayad Allawi）所支持，司法部長施汪尼也是技術官僚，爲庫德族裔，並由「庫德愛國聯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 PUK）所支持（The Baghdad Post, 2019）。雖然看起來多半爲技術官僚出身，但是事實上也爲各政黨所支持，因此未來是否能夠擺脫政黨的束縛，仍有待觀察。

二、衝突的解決過程仍是「權力分享」與「實力為主」

在伊拉克衝突的過程中，民眾希望解決的是政府貪腐與無能，但政治人物仍著眼於職位的爭奪，主要討論均在職位如何分配的機制上。什葉派之間的分裂導致他們無法形成一個什葉派多數政府，只能選擇與庫德族與遜尼派合作，最大黨「前進聯盟」的領導人薩德爾一再要求總理應該要獨立並形成技術官僚的政府，並呼籲應該團結合作，因爲「伊拉克很快就變得無法居住，缺水、缺電、缺錢且毫無邊界可言」（Bengio, 2018）。從 2003 年聯盟行政當局執政時期，便已經種下了宗派主義與種族間對抗的種子。「去阿拉伯復興黨化」的過程中，卻無法控制什葉派政治人物藉由「去阿拉伯復興黨」的過程打擊異己（王順文，2018：154），伊拉克的阿拉伯裔什葉派一樣使用過去復興黨的壓迫式的統治方式，並視其自己爲解放者與保障者，相對的阿拉伯裔的遜尼派認爲 2003 年以前的記憶爲光榮的回憶，認爲當時沒有民兵的控制、宗派的對抗與伊朗或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Alaadin, 2017: 4）。同時，宗派的對抗也造成遜尼派幾乎每月就有 1,000 人受到什葉派民兵的殺害（Alaadin, 2017: 5），缺乏正當法律程序也讓許多官員可以藉由羈押來勒索，同時還有「不存在的雇用」（ghost employees and soldiers），使得用人唯私的狀況更加嚴重，進而產生穩定的恩庇體系。

也因此，如前所述，馬赫迪總理的任命部長的過程中，也無法脫離政黨的分配，基本上也是在 *Muhasasa taifa* 的安排下而非根據議會民主。如同 Toby Dodge (2018) 所言，國際社會重複地對於特定的政治人物有過多的期待，他認爲馬赫迪就如同 2006 年馬利基取代賈法里（Ibrahim al-Jaafari）成爲總理時，或如當阿巴迪取代馬利基時的情況類似，最後都因爲無法解

改爲民族智慧趨勢黨，與伊朗關係良好。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決系統性的失敗，其面對貪腐的改革也會受到這些傳統擁有權力者的影響（Dodge, 2018）。

而另外一個解決暴力衝突的機制，卻也是未來伊拉克衝突的潛在危機的存在便是民兵的角色。由於伊拉克「武器與現金至上」（supremacy of the men with guns and cash）的觀點仍難改變（Alaadin, 2017: 3），一方面展現在政治人物要求職務分配以維繫其恩庇制度外，另一方面便是因爲政府無能力提供安全與公共服務，使得民兵與極端份子一直有存在的空間（Alaadin, 2017: 2）。

同時爲了對抗伊斯蘭國，亦有許多民兵的加入，雖然有時候在政府軍的協調下，但是卻不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而在伊斯蘭國被擊敗後，誰來填補權力的空間便成爲最大的問題，並產生了民兵的角色是否是對於國家社會的威脅，甚至是外國的代理者與罪犯的爭議（Aladdin, 2017: 10）。有學者便認爲，未來的衝突將會在什葉派之間，因爲許多什葉派的民兵並不受政府的控制，但是卻在政府的架構下，使用政府的資源。比方說伊拉克的最有力的民兵組織「巴達爾組織」（Badr Brigade），過去便主導著聯邦的警力，並掌控內政部，而相對較親近伊朗的「人民動員力量」也常常跟政府軍產生衝突（Alaaldin, 2018），而「巴達爾組織」[26] 的主事者阿梅里亦爲「人民動員力量」的實際領導人，同時也是 2018 年國會選舉第二大黨「征服黨」的黨魁。隨著在選舉中取得正當性，同時民兵訓練也較貪腐與無效能的政府軍來得好，因此民兵的立場以及對於國家資源的分配仍會是衝突的所在。[27] 不過也有學者認爲民兵也可能是韌性的所在，因爲這些民兵都

[26] 巴達爾組織可追溯至1982年由伊朗支持的「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 SCIRI），之後又改名爲「伊斯蘭最高委員會」（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 ISCI）以表明與伊朗的距離。2019 年批評者批評阿梅里只希望取得某些部長，而非人民的需要，而事實上在沒有伊斯蘭國的威脅後，伊拉克的內部民兵組織因爲沒有共同的敵人，也相互有不同意見，甚至暴力衝突（Al-Marashi, 2019）。

[27] 更有甚者，有報導指出什葉派的「人民動員力量」卻吸納了遜尼派的前伊斯蘭國的戰士，使得「人民動員力量」民兵組織得以進入伊拉克北部的遜尼區域，而伊斯蘭國的戰士則得以重新進入伊拉克的社會。因爲過去「人民動員力量」民兵長期被視爲是伊朗的代理者，因此在遜尼爲多數的區域很難運作，根據 Foreign Policy 的訪問，當地的遜尼派部落對此感到擔心，過去相關城鎮是由遜尼派的阿拉伯人並與庫德族的政黨有

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用資料庫

主張伊拉克的民族主義，民兵本身有多重的認同，民兵組織也能夠確保伊拉克社會不受外部行爲者影響的韌性（Aladdin, 2017: 10）。

不過，最重要的是伊拉克的衝突根源，也就如何解決公共服務無效率的問題，短期內仍無法看到解決的前景。伊拉克的人口中，0～14 歲佔了 39%、15～24 歲佔了 19.42%，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低於 24 歲以下，但全國的失業率高達 16%，特別是 15～24 歲的失業人口則高達 25.6%，低於貧窮線的人口多達 23%（Alaadin, 2017: 6-7；CIA, 2019），每年都有 50 萬的人口會在就業市場尋找工作，這些失望且失業的青年人口，仍會是不穩定的因子。而在改革的方案上，伊拉克長期有對於「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討論（王順文，2018：146），而改革者是否能夠與貪腐與缺乏問責的系統對抗，也將是未來是否能夠建立衝突韌性的重點（Aladdin, 2017: 11），不過，不可否認的，伊拉克的改革仍會受周邊行爲者的影響（王順文，2018：163-164），比方說敘利亞、伊朗與伊拉克的連動性，都會影響伊拉克的和平深度與衝突韌性。

肆、庫區獨立公投與組建政府的衝突

庫區與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間的衝突以及庫區政府本身的衝突，則是本文另外一個討論與比較的重點。庫區政府在 2017 年 9 月下旬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獨立公投，卻引發庫德區自治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衝突。同時，庫區政府的議會選舉也導致了庫區政府內部一系列的衝突與妥協。以下則針對庫區的衝突類型以及衝突的解決進行分析。

一、庫區政府的衝突情勢

(一) 庫區獨立公投後所引發的庫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衝突

庫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衝突主要在於公投與基爾庫克省(Kirkuk)的問題。在公投後的一個月內，伊拉克政府軍佔領了庫德族原先所控制的五分

密切的往來，但是現在這些與極端份子有關的人已經找到介入的方式（Mironova & Hussein,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一領土，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對於基爾庫克及其油田的重新控制，同時，並對於庫德區的主要城市艾比爾（Erbil）及蘇萊曼尼亞（Sulaymaniyah）國際航班頒布禁飛令，並延長至 2018 年 2 月底等措施，以封鎖庫德區的相關經濟來源。雖然最後自治區的總統巴爾扎尼（Masoud Barzani）[28] 宣布辭職，[29] 庫德區政府後來雖然提出了凍結公民投票的結果，甚至宣布將尊重伊拉克聯邦法院的判決（也就是庫德區的公投是違憲）（Chomani, 2017），但是巴格達中央仍然要求全面廢除該結果，而非僅是表達尊重，並以國際機場的持續封鎖作爲代價，作爲談判的先決要件，同時，亦可能在談判中要求所有石油的收益與關稅、費許卡博（Faysh Khabur）與伊布拉欣・艾卡里（Ibrahim Khalil）兩地的過境管理權力，並允許伊拉克軍隊在該兩地部署，這兩地是巴爾扎尼家族爲主導的 KDP 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Chomani, 2017），也就是給 KDP 施加壓力。

另外，伊拉克政府軍隊佔領基爾庫克後，阿拉伯裔開始希望恢復海珊時期推動「阿拉伯化基爾庫克省」的舉動，新任省長賈布里（Rakan al-Jabouri）並簽署行政命令授權超過 80 個什葉派阿拉伯人返回香納哈區（Shanagha），他認爲既然這些居民在人口資料中有紀錄，自然不能反對其返回家園，但遭到薩拉加朗（Sargaran）市的市長反對，[30] KDP 認爲此爲違憲與違法的，主張依據伊拉克的憲法，基爾庫克省委員會才能夠選舉其省長，而非由中央直接任命（Rudaw, 2018a）。同時，面對與中央的衝突，庫區政府曾試圖將衝突提高爲伊朗在背後的影響，以尋求支持，比方說巴爾扎尼派的媒體主張「人民動員力量」與伊朗的革命衛隊是攻擊基爾庫克的主力，目的要

---

28 爲了避免名字上的混淆，僅在此處使用巴爾扎尼總統一詞，其他地區如其兒子馬斯羅爾（Masrour Barzani）總理與繼任的內奇爾萬（Nechirvan Barzani）總統則維持原文，不另行翻譯。

29 這部分也受到國際壓力的影響，一戰後的疆界區分，使得庫德族散落在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與伊朗等國，而這些周邊國家連同美國，都反對伊拉克庫區的公投，特別是土耳其長期與庫工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 K. K.）的民兵處於交戰的狀態，從 2015 年開始更造成了超過 3,200 人的死亡，因此在庫區公投之後，土耳其與伊朗便立刻支持巴格達中央對庫區領袖持續施壓，各國的壓力也間接導致巴爾扎尼總統的下台（Peçanha, 2017）。

30 香納哈區是薩拉加朗市的一個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破壞伊拉克的團結（Mirzaei, 2017）。不過，隨著庫區政府不再針對獨立公投的問題有下一步的動作，中央政府也逐步解除禁飛令，使得衝突點將落在基爾庫克省的未來上。

(二) 庫區內部的衝突

雖然庫區與中央政府有所衝突，但不代表庫區就是一體的，因爲庫德族本身在語言上就沒有統一、也非同一宗教，有些是遜尼派，有些是什葉派，甚至有些是基督教等，更包含雅茲迪族（Yezidi）、阿列維派（Alevi）與猶太人。同時，並非所有庫德族都有共同的意識形態與希望建國，可能也與區域及歷史不同（Mirzaei, 2017）。

而庫區中的兩大政黨也曾在 1994 年便曾因爲權力分享的分歧，進而引發內戰，後來才在 1998 年簽訂「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greement*），隨後兩黨更共同參與 2003 年推翻復興黨政權的行動，也促成了後來爲了庫德區的自治問題再度合作，不過內部仍然是有許多的矛盾，最明顯的還是權力分享的問題。[31]

最後，當地的衝突還有來自於當地的貪腐問題，所有的資源分配上，

---

[31] PUK 過去的創立者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亦爲伊拉克的前總統），長期倡導庫德族的自治，但與伊拉克中央關係較爲良好，隨著他 2017 年的去世，PUK 與 KDP 是否又會回到過去的衝突，也是衝突韌性能否建立的核心議題。另外，過去庫德族支持前總理馬利基，主要是他強調對伊朗的獨立性與對聯邦主義的支持，但是後期馬利基被稱爲堅定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就漸行漸遠（Yildiz, 2012: 63），而現在 KDP 在伊拉克國領導人表達的支持，是爲了要給現任的總理壓力的策略，還是會進一步造成兩大政黨的分歧，也會影響未來的發展。

另外，在基爾庫克的議題、石油以及庫德族自治問題上，兩個主要政黨 PUK 與 KDP 便有不同的主張，或如 2010 年的伊拉克國會選舉中，庫德族與遜尼派便共同主張應該採取「選人又選黨」的開放投票，揚言如果沒有接受，將會杯葛選舉，最後促成選舉法規的修改，同時也增訂了「不在籍投票」（Yildiz, 2012: 76）。而從 2009 年 6 月 24 日庫德自治區通過庫德區憲法開始，便與巴格達中央產生許多的衝突，其中最大的爭議在於庫德區憲法的第 2 條條文，將爭議的基爾庫克納入，同時在第 3 條禁止在庫德區域內形成新的區域，也就是不接受庫德區中，有任何區域獨立，並保留若中央政府放棄聯邦體制或民主人權時，庫德區從伊拉克聯邦獨立的權力（Yildiz, 2012: 68），這些作爲加上 2017 年的獨立公投，都成爲阿拉伯裔的伊拉克中央與庫德族的庫德自治區衝突的根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沒有跟當地兩大政黨的家族有直接的聯繫，很難繼續下去（Yildiz, 2012: 65），因爲工資的缺發，導致包括在蘇萊曼尼亞等地產生許多抗議的行動，甚至造成 200 多名示威者被捕、5 人喪生的事件（Bar'el, 2017），許多民眾對於兩大政黨的不滿，亦是內部衝突的主要因素之一。

再者，庫德區的情勢甚至還牽涉到 2018 年的伊拉克國會選舉，以及庫區政府的議會選舉，也使得情勢更加複雜。庫德自治區中的 PUK 與 KDP 分岐在獨立公投後持續擴大，如當時的巴爾扎尼總統在伊拉克中央政府軍佔領基爾庫克時，曾指控 PUK 從基爾庫克撤退是叛國行爲。同時，KDP 認爲關於伊拉克總統候選人應由兩黨共同同意，因此反對由 PUK 所提名的薩利赫擔任總統，並自行提出侯賽因（Fuad Hussein）擔任該黨總統候選人（Barzani, 2018）。亦有報導指出，前總理馬利基試圖利用此一情勢，尋求與庫德族的聯盟，[32] 而 KDP 在伊拉克國會的領導人阿克朗（Arafat Akram）表示庫德族有可能會與其結盟。

庫區的議會在 2018 年 9 月底舉行選舉，選舉結果 KDP 獲得 45 席次，PUK 獲得 21 席次，較明顯的改變是在 2013 年選舉中獲得 24 席次的改變運動黨（*Gorran*）大幅下降了得票席次，僅獲得 12 席，而相較於 2013 年的選舉，強調伊斯蘭主義的政黨所獲得的席次下降。在庫區議會的席次中，還有 11 席是保留給宗教與種族的少數，5 席給土庫曼裔、5 席保留給基督徒，1 席則保留給亞美尼亞裔。但選後卻延伸了兩大黨的矛盾。PUK 的發言人皮拉（Saadi Ahmed Pira）宣布因爲他們認爲有選舉舞弊的情事，該黨將拒絕承認選舉結果（Aldroubi, 2018b），而兩黨也陷入爭議，導致新的內閣無法形成。

兩黨在 2019 年的 6 月達成初步協議，由馬斯羅爾・巴爾札尼（Masrour Barzani，爲 Masoud Barzani 之子）擔任總理，而曾經擔任庫區總理長達 7 年

---

[32] 在國會選舉之前，伊拉克前總理馬利基在接受 Rudaw 新聞網的訪問時指出：「協商應該要在一個基礎上進行，也就是對於共同的國家夥伴關係下……庫區的情勢應該再惡化之前盡快解決，中央政府能協助庫區政府面對相關挑戰，但是庫區政府也應該採取行動與中央政府在憲政脈絡下互動」，他並支持無條件的對話，不過庫區的官員認爲，此說法爲「馬利基試圖在選舉過程中獲得庫德族的支持，因爲庫德族與阿巴迪總理的衝突，使其認爲有機會可以利用」（Jazaeri, 2017）。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的內奇爾萬・巴爾札尼（Nechirvan Barzani）則自 6 月起擔任庫區總統。在 21 個新的內閣部長中，KDP 的成員擔任 9 個部長職位，PUK 則獲得 6 個部長，PUK 的庫巴德・塔拉巴尼（Qubad Talabadni, Jalal Talabani 之子）則維持擔任副總理的職位，另外有 4 個部長職位分配給改變黨（*Gorran*）與庫區社會主義黨（Kurdistan Socialist Party），而根據宗派的配額（sectarian quota），基督徒少數也有一個部長職位（Arab News, 2019）。

同時，庫區的主要政黨爲了要在 2020 年的幾個爭議省份獲得勝利，宣布成立「庫德族聯盟」（Kurdistani Coalition），要求伊拉克中央政府依據憲法 140 條中所提到的「爭議區域應該交付公投」，將爭議區域如基爾庫克、摩蘇爾、尼尼微（Nineveh）、迪亞拉（Diyala）、撒拉丁（Saladin）等區域，依據公投解決歸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爾庫克。庫區的主要政黨將共同推動一份庫區共同的候選人名單，[33] 只有反對黨「新世代黨」（New Gerneration）強調在 KDP 的領導下他們不會加入（Dri, 2019）。至此，庫區的衝突與爭議，似乎得到了解決，接下來則探討爲何庫區政府能夠達成衝突韌性的原因與其解決機制。

二、衝突的解決機制

(一) 庫區與中央的衝突機制在於利益的分配

石油利益與基爾庫克的問題也是庫區與中央爭執的所在。過去幾年庫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爭議也包括直接與其外商簽訂契約，最著名的就是 2011 年庫區政府與埃克森石油（Exxon Mobil）公司所簽訂的石油探測的契約，中央政府就認定是侵犯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主權問題，同時其中有兩個探測區域已經跨越了停火線，而特別是巴什卡（Bashiqa）此處的油田，也在公投後爲中央政府重新掌控（Peçanha, 2017）。2014 年面臨伊斯蘭國的威脅時，庫區政府也擴張了相關的區域，而這些區域也是石油產量較爲豐富的區域，包含了基爾庫克此一多族群的百萬人口城市，不過就在獨立公投過後，政府軍宣稱重新控制了基爾庫克及其附近的油田與城鎮（Peçanha,

[33] 包括 KDP、PUK、庫德斯坦伊斯蘭聯盟（Kurdistan Islamic Union, KIU）、變革運動（Change Movement, Gorran）與庫德斯坦伊斯蘭團體（Islamic Group, Komal）等政黨。

臺灣大學政治學期刊資料庫

2017），而從 2014 年開始，庫區政府就透過土耳其的油管，將此區的原油轉售到以色列，而根據 2015 年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的報導，77% 以色列石油進口來自於庫德佔領的基爾庫克區域，並藉由土耳其傑伊漢（Ceyhan）的油管送至以色列的阿什克隆（Ashkelon）（Engdahl, 2017），而在庫區政府獨立公投後，土耳其也因爲擔心激發境內庫德族的獨立運動，而切斷此油管。

伊拉克中央政府解決衝突的方式，首先是與傳統與中央政府較爲友好的 PUK 已故的領導人塔拉巴尼秘密會談，並達成 PUK 所控制的敢死隊（Peshmerga）軍隊和平的撤出基爾庫克的結論（Engdahl, 2017），也因此 KDP 不斷地宣稱 PUK 背棄了獨立公投的結果，但是 PUK 則認爲他們的決定避免了大量的傷亡。

同時，由於伊拉克中央政府重新掌握基爾庫克與巴伊哈桑（Bai Hassan）的油田，意味著中斷了庫區政府每天約 120 萬桶原油的掌控權，也使得談判的情勢逆轉，在庫德族獨立公投之前，庫區政府基本上是拒絕與中央政府協商的，但是在相關制裁生效後，反而是中央政府對於協議增加許多前提，2017 年 12 月 25 日由庫區總理 Nechirvan Barzani 主動致信給當時的伊拉克阿巴迪總理要求開始協商，而非只是在媒體放話（Jazaeri, 2017）。2018 年 9 月前總統巴爾扎尼雖仍強調庫德族公投有其合法性，但也強調「開啓新頁與解決問題需要考量到共識與夥伴關係，以避免過去的問題重複發生」的重要性（Goran, 2018）。

最後，在利益的需求下，庫區政府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選擇，而由於庫區政府表明與中央合作的意願，中央政府也決議給予庫區政府兩倍的經費，不過此項決議並不保證未來也會有相同的經費撥付，並在 2019 年的預算法中，規定庫區政府每天應貢獻 25 萬桶的石油輸出給中央政府出口，如果庫區無法達成，將面臨財政上的處罰（Iraq Oil Report, 2019）。

(二) 庫區內部的衝突機制在於權力分享機制的落實

庫區內部的衝突問題主要在於政府職位的分配，因此，KDP 的策略便是個別擊破。透過個別與各個政黨商談，並分別簽訂組閣協議，以求共識的形成。而從選舉的結果來看，KDP 當然可以跳過 PUK，與其他小黨共組

臺灣大學圖書館

聯合政府，但是如此一來卻可能減少其在公投後的正當性危機，因此，較佳的策略就是盡量能夠將各黨納入，並找到平衡點（Duman, 2018: 9）。

2019 年 2 月 16 日，改變黨（*Gorran*）與 KDP 簽訂協議，達成數名部長、副總理與新成立的反貪腐委員會的共識，改變黨則同意支持 KDP 的候選人續任總統。只有新世代運動黨（The New Generation Movement）強烈反對與 KDP 合作，他們認爲主要兩政黨 KDP 與 PUK 都是無可救藥的貪腐（hopelessly corrupt）（Rodgers, 2019）。

最後，主要的困境來自於兩大黨的協調。2017 年獨立公投後，PUK 被強烈指責未能堅守陣地，被備受批評，但對於 PUK 而言，仍希望能夠控制基爾庫克，可是基爾庫克內部的阿拉伯裔與土庫曼裔與中央政府關係都相當良好，所以，與庫區的對手 KDP 合作是有必要的，而對於 KDP 而言，他們最希望的就是繼續維持在庫區執政的優勢，但是對於庫區政府的形成爲庫區自治的範圍，不受巴格達中央的控制，因此 KDP 可以等待。因此，相對而言 PUK 不論在選後的情勢與所企圖得到的利益上都較居劣勢（Nawzad, 2019）。最後，兩黨在 2019 年 3 月 4 日簽訂了四點協議，雖然 KDP 的發言人強調兩黨並沒有談及部長的安排，但整體仍是具有象徵意義的邁進（Rodgers, 2019），最後兩黨也達成相關部長提名的共識。

三、利益分配與權力分享機制仍為主要考量，但衝突的根源仍在

庫區的問題或者說庫德族的問題，從一戰期間 1916 年的「賽克斯－皮科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1920 年的「賽佛斯條約」（*Treaty of Sevres*）後就已經存在（鄭慧慈，2008：104），雖然庫德族本身也有許多的多樣性，但是伊拉克庫區人民希望獨立於中央政府的想法並沒有改變，[34]

[34] 對於公投的問題，曾任選委會委員的受訪者 Hayman Hussein Mirkhan 博士表示此問題要回到 2003 年庫區自願參與建立伊拉克聯邦的時候，當初庫區所追求的就是「權力分享」與聯邦主義。當初各方都沒有反對，但是近期巴格達的政治人物開始改變，不再相信聯邦主義，且不相信權力分享，多半主張多數統治。最明顯的就是在基爾庫克的石油問題，庫區在對抗伊斯蘭國也做出很多的付出，可是中央政府卻不願意尊重庫區的權力，就會產生問題。

同時，之所以要提出獨立公投，原先收到的資訊是巴格達與周邊國家並不反對，同時，庫區也不可能在巴格達一再的進行中央集權的作爲下，而選擇讓步，這是庫區「沒有選擇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因此，庫德區與中央政府的衝突，仍會因爲庫區人民希望獨立的以及利益的分配而有所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庫區基本上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區域，庫區擁有伊拉克將近半數以上的可耕種區域，加上豐富的石油資源，若利益無法妥善分配，相關的議題仍會再度引起衝突。

但庫德族的分裂也難以解決，還包含了歷史因素與外來者的角色。KDP 與 PUK 在歷史上的對立，特別是在復興黨統治期間，兩黨將近 20 年以上處於敵對的內戰狀態，而在獨立公投案上，PUK 內部也有分歧意見，有些人擔心其對庫區會產生如何的結果，如塔拉巴尼的兒子 Bafel Talabani 便主張獨立公投爲「巨大的錯誤」（colossal mistake），有人認爲，撤軍的協議拯救了許多可能衝突造成的生命傷亡，也避免伊拉克軍隊與「人民動員力量」與庫區軍隊的對抗（Mirzaei, 2017）。

雖然在共同利益與權力分享的情況下，兩黨達成協議，但是是否能夠形成傳統，則仍有待觀察。雖然筆者前往庫區政府移地研究並訪談許多政黨人士時，受訪者均表示庫區政府有多元合作的傳統，也是最承認多元種族與宗教，並尊重其共存的伊拉克區域。但是亦也有文章表示反對，認爲此一傳統似乎並不存在，巴爾扎尼與 KDP 長期對境內的雅茲迪族與基督徒的雅述人等少數壓迫，[35]同時巴爾扎尼政權更透過暗殺與貪污等方式控制庫德自治區（Engdahl, 2017）。

再者，政黨之間的合作未必代表庫區已經找到衝突的韌性，貪污腐敗的問題，仍是需要被解決的。比方說根據半島新聞的報導，庫區的年輕人對於過去巴爾扎尼與塔拉巴尼在 1980～1990 年代帶領庫區對抗巴格達中央的歷史參與感薄弱，相對的，他們所面臨的是社會與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失業的問題最爲嚴重。

下的結果」。庫區只是誠實地把問題提出來，而且這可以是一種「活命的計畫」（survival plan）。再者，伊拉克的憲法本身也不排斥公投，庫區認爲這樣並沒有違背憲法。

35 「雅述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自土耳其、伊朗的基督教新移民，多數居住在巴格達、摩蘇里及伊拉克西北部的鄉村，現代雅述人認爲自己源自於古「亞述人」、阿拉姆人及兩河流域的居民，一至三世紀便信仰基督教，1918 年，英國安排二萬名亞述人居住在伊拉克北部的札胡（Zakhu）及打胡克等村落，便經常跟阿拉伯人起衝突（鄭慧慈，2008：108-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庫區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介於 18～34 歲之間，而根據庫區的統計資料顯示，20% 以上的青年人口對於尋找工作感到失望，而其他正在尋找工作的年輕人中，亦有近 30% 的人無法找到工作，而許多工作則控制在兩大黨手上，且深受恩庇制度與用人唯私所影響（Aljazeera, 2018），整體而言，庫區的失業率約在 20%，但青年人口的失業率則高達 30%～40%，同時，此區域也還無法全日供電，[36] 而根據國際透明組織的報告，庫區仍是世界上貪污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雖然比伊拉克中央政府來得低，且對抗貪污的措施相當有限，2018 年在 198 件被起訴的貪腐案件中，只有 33 件被判刑（Alaca, 2019: 6）。

因此，庫區政府的衝突韌性討論上，雖然我們可以說在權力分享的機制上似乎較伊拉克中央政府更爲妥善，[37] 但並不代表其可以預防未來衝突，甚至是暴力的產生。與伊拉克整體的問題相同，菁英之間的協調較易因爲共同利益的追求，而有妥協的空間，但是內部貪腐與治理的問題無法解決，仍會是衝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庫區的問題也涉及到外部行爲者的問題，包括美俄兩國與周邊國家在此區的利益與衝突，皆會影響此一區域未來的和平。比方說 Ralph Peters 在 2006 年所提出的「人道的」（humanitarian）且「正確的」（righteous）重新安排疆界（Nazemroaya, 2006），恐怕會引起更多的衝突。

而傳統美國與西方就有許多的投資項目，但是就在庫德族公投之後，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Rosneft）執行長 Igor Sechin 宣佈該公司同意投資庫區 400 萬美金增加油管的建置，並掌握了 Kurdish KAR Group 將近 60% 的股權，同時俄羅斯也掌控了在敘利亞的 Al-Tabiya 天然氣田，也迫使了依賴此一天然氣管線的土耳其必須更加考量其與俄羅斯的關係（Engdahl, 2017），

---

[36] 如筆者於庫區參訪的過程中，在艾比爾國際機場就曾遇過停電的情形，同時，一天之中，也會有幾次斷電的狀況。

[37] 如受訪者基督徒的 Abdoka 部長與 Mirkhan 教授均認爲庫區具有多元文化的傳統，並在憲法上也保障多元文化的存在，他們並以 2016 年爲例，該年有 8 個教堂在巴格達被關閉，但卻有 5 個教堂在庫區又開始運作。因此，受訪者表示，這是因爲庫區的公民社會本質是開放的。庫區各個族群傳統就住在一起，但是巴格達未必，在那裏國家與宗教是一體的。也因此開放傳統，伊斯蘭國才會把庫區政府視爲敵人，將庫區視爲是西方的一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加上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的衝突，使得卡達、伊朗、土耳其、俄羅斯與中國是否形成一個新的地緣政治的行爲者，同時美國在敘利亞庫區的撤兵，都影響了整個庫區未來的發展。

伍、宗派主義的衝突與阿巴音節

一、宗派主義的衝突與阿巴音節的和平維繫

宗派主義的衝突爲伊拉克衝突長久存在的問題，但是否影響到和平的深度，導致因爲宗派的分歧而無法使暴力消失，則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爲，將 2003 年視爲是伊拉克宗派之爭的分水嶺是誇大其詞，頂多可以視爲是政治上走向對立的一個開創點（Copernica moment）（Haddad, 2017: 101），因爲伊拉克的宗派是以一種複雜的形式所形成，包含了宗派認同、階級、種族與區域的考量等綜合性的結果，比方說 1970 年代的阿拉伯復興黨結構中，多數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伊拉克西部，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親疏關係，而非清眞寺，也就是他們的連結而非其宗派來源（Haddad, 2017: 107）。而過去的遜尼派在少數的統治情況下，原本並沒有宗派的認同，對遜尼派而言，反而是外在勢力的佔領、庫德族的獨立運動、伊朗支持的什葉派伊斯蘭主義者，被其認爲是主要的威脅（Haddad, 2017: 119），甚至在什葉派之間，也受到地域與階級的影響。[38]

因此，本段落主要探討的便是宗派之間是否有衝突的問題，並以什葉派的阿巴音節爲例。若宗派衝突眞的有這麼大，則以什葉派爲主的阿巴音節，將成爲遜尼派的主要標的。但近年來參與阿巴音節的人數卻越來越多，安全的維護上卻越來越穩定。以 2017 年的阿巴音節爲例，在爲期兩周的朝聖期間，並沒有發生嚴重的安全事件，共約有 5 萬多名的安全人員參與維護安全的行動，整體參加阿巴音節的人口估計約有 1,380 萬的朝聖者，其中更有從各地而來的朝聖者（如 200 多萬伊朗人透過簽證入境、3 萬多的

[38] 比方說 *shrug* 這個詞常常就是東南部的伊拉克人，也連結到工人階級，甚至是所有的南方人，甚至是在巴格達中產階級的什葉派，也不會對這個詞產生反感（Haddad, 2017: 107-1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阿富汗人、20 萬的海灣地區其他國家人口），從參與的人口數來說，阿巴音節已經超越每年平均 300 萬人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朝聖活動（Peterson, 2017）。

而爲了讓 2018 年的活動順利，當時的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宣布將會逮捕任何利用宗教活動散播仇恨言論的人，以解決過去每年在阿巴音節期間，仍可看到許多什葉派的宗教人士，利用旗幟或標語等方式，傳達侮辱遜尼派人士的口號的問題，此舉並獲得大阿亞圖拉希斯塔尼的支持（Saadoun, 2017），而 2018 年的活動也大致順利進行。

但是隨著伊斯蘭國的瓦解，2019 年的活動似乎又蒙上一些陰影。2019 年 9 月在卡爾巴拉又發生汽車炸彈的攻擊，該次攻擊造成 12 人死亡 5 人受傷，而伊斯蘭國宣稱其主導該項攻擊，由於過去兩年從未發生類似的炸彈攻擊，這也顯示伊斯蘭國仍是伊拉克內部不穩定的因素之一，[39] 宗派之間的衝突是否會再度點燃，則是關心的重點。

二、衝突的解決機制

爲了解決相關衝突的可能爆發，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成功的機制。首先就是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協力合作，其次就是伊拉克民族主義的角色，最後則是宗教人物的角色。

(一) 政府與民間的協力合作

在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合作上，多數民眾在這段期間免費的提供飲用水、食物、帳篷等，並將其視爲是宗教的義務，而當地政府並協助協調與管理，以維持和平、避免衝突，如本研究所取得的阿巴音節手冊中，便可以看出當地政府、民間團體、宗教團體甚至是來自伊朗的團體共同合作的狀況

[39] 根據報導，執行汽車炸彈攻擊的嫌犯來自於巴格達南部的一個遜尼派城鎮朱爾夫賽賀爾（Jurfal-Sakhar），該城鎮 9 萬人左右的人口在 2014 年受到什葉派的攻擊並迫使其離開家園，而這些受害者雖然一直想要回到家鄉，可是卻受到周遭希拉市（Hilla）的什葉派所反對，他們擔心他們的回歸家園將會給予伊斯蘭國一個威脅他們的據點（Cockburn, 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arbala Center for Studies and Research, 2018）。[40] 比方說民間提供了包括車輛（以當地爲主）、橋樑管理則主要由外來團體協助（15 位當地工程師與 700 名外來工程師）、維持當地安全的所需人力（交通 599 本地人、139 名外地；民間安全防衛 815 名本地人、115 名外地人；警力 19,059 人由本地投入，另由外地支援 549 人），其他還有包括清眞寺的志工、醫療志工等。

(二) 伊拉克民族主義與伊朗的介入

伊拉克的民族主義的韌性則呈現在參與者的認同感上。參與朝聖者通常會攜帶著黑色、綠色、紅色與白色的旗幟，黑色主要是在對於伊瑪目 Hussein 表示崇敬，但根據報導顯示，2017 年開始有更多伊拉克的國旗參與遊行隊伍（Sayah, 2017），也顯示參與者對於伊拉克的認同提升。當然，這部分也與伊朗在阿巴音節扮演重要的角色有關。

伊朗人是阿巴音節的朝聖活動主要的來源，同時伊朗政府也樂於推動此項朝聖活動，過去伊朗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曾以收復卡爾巴拉勝地作爲宣傳的手段，而朝聖的開始，也意味著什葉派伊斯蘭某種程度戰勝了世俗的、西化的領導人（Rabkin, 2014）。隨著 2003 年海珊的下台與恢復了此一慶典，參與朝聖的伊朗人越來越多，隨著一開始各項工作混亂，德黑蘭決定參與並扮演角色，2005 年 4 月伊朗與伊拉克簽訂協議，每日允許 1,500 的伊朗朝聖者進入伊拉克，2009 年達到每日 5,000 人，2011 年更達到每日 6,000 人（Rabkin, 2014）。2005 年 7 月，伊朗成立一個半官方的組織「伊朗朝聖服務提供者組織」（All-Iran Central Company of Pilgrimage Service Providers, *Sharekat Markazi-ye Dafater-e Khadamat-e Zeyarati-e Sarasar-e Iran*，簡稱 SHAMSA），以提供朝聖者套裝行程，由於 2009 年約有 80 個伊朗人在朝聖的過程中受到自殺炸彈的攻擊而死亡，因此，SHAMSA 壟斷了行程、交通與住宿的安排，甚至成立了中央廚房，在卡爾巴拉由伊朗人的員工爲伊朗朝聖者所居住的旅館，提供每日兩餐的服務（Rabkin, 2014）。[41]

---

[40] 該附件原文爲阿拉伯文，經伊朗籍的顧朋博士（Manouchehr Ghorbani）博士協助取得，並摘要翻譯而成。

[41] 同時，該公司也要求所有參與者不能接受當地免費提供的任何禮物，包括麵包、甜點、茶、香菸等等，並指派符合伊朗政權的專業領隊，沿途解說（Rabkin, 2014）。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也因此，紐約時報的報導便認爲這是伊朗透過「軟實力」來增加其對伊拉克政治的影響程度（Dagheer, 2009），伊朗可以透過這些安排，提供與伊朗友好的伊拉克政黨有關聯的公司進行合作，進而達到對伊拉克的控制。同時，亦可以看到伊朗的許多人士參與阿巴音節的運作，並且從畫面上亦可以看到伊朗大阿亞圖拉哈米尼（Ali Hosseini Khamenei）的圖像，也因此有伊朗介入運作阿巴音節的疑慮（Sayah, 2017）。

2018 年隨著美國對伊朗制裁的開始，加上伊朗對伊拉克南部的斷電，也引起伊拉克內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是反對伊朗介入伊拉克內政的聲音提高，但另外一種聲浪則是那些受到伊朗資助的伊拉克政黨與團體，則更堅定地抵抗美國的制裁（Bengio, 2018）。

(三) 宗教人物的影響力

伊拉克的宗教人物中，最著名的就是大阿亞圖拉希斯塔尼的影響力。希斯塔尼向來主張宗教與政治的分開，並且支持包容性的伊拉克民主，因此，希斯塔尼在伊拉克政治中長期扮演重要的角色（Sayah, 2017）。比方說 2004 年希斯塔尼要求聯盟行政當局必須保證制憲會議代表的選舉爲開放性的選舉，否則將祭出裁決（*fatwa*），要求伊拉克民眾不支持聯盟行政當局決議（McCarthy, 2004），並導致美國主導的聯盟行政當局在決策上的讓步（王順文，2018：157-158）。另外，希斯塔尼也在促使前總理馬利基下台一事上有很大的助力，同時，希斯塔尼也與遜尼派的領袖共同在 2014 年 6 月共同發布 *fatwa*，要求伊拉克的公民能夠支持政府軍隊對抗伊斯蘭國，都展現希斯塔尼與宗教對於伊拉克的影響力（Rohwerder, 2014: 14-15）。

雖然希斯塔尼並沒有任何政治職位，但是其權力是由官方所認可的，2005 年伊拉克國會通過《清眞寺行政與著名什葉派朝聖地法》（*Administration of the Holy Shrines and the Noble Shiite Pilgrimage Sites Law*），伊斯蘭清眞寺的人事任命權可以從「由最高宗教當局（*marja*），從品格良好的正直人士中選擇」，因此，希斯塔尼的任命權對於其掌控朝聖過程有其重要性，如 2012 年阿巴音節舉行前，卡爾巴拉的伊瑪目胡笙清眞寺便發佈了一個相當詳細的手冊，說明包括安全、衛生與儀式等說明，同時卡爾巴拉的首長也認同希斯塔尼與其支持者可以制定與管理朝聖的相關活動（Rabkin, 2014）。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而希斯塔尼與其代表的系統於週五所發表的談話，也影響信徒的內容，從週五談話的內容中分析，主要呈現的重點文字仍在國家、人民、治理、伊拉克、恐怖主義、安全、貪腐等問題上，[42] 足見宗教領袖對於維繫伊拉克此一國族的存在仍扮演重要角色。

希斯塔尼對於伊拉克主權的強調還可以從 2019 年 3 月伊朗總統羅哈尼（Hassan Rouhani）訪問伊拉克時特別拜訪希斯塔尼的談話中展現。希斯塔尼表示歡迎對於兩國在互利與相互尊重主權與不干涉對方內政的情況下，增進彼此的關係（Al Arabiya English, 2019）。

除了希斯塔尼本人以外，有些民兵組織是由希斯塔尼所控制的清眞寺所組成，如伊瑪目阿里營（Iman Ali Brigade），而在「人民動員力量」中也有許多希斯塔尼的宗教教義追隨者，相對的，也有些遜尼派的組織是與政府軍合作，如過去的「遜尼派之子」（Awakening Movement）（Aladdin, 2017: 11）。

此一宗派對政治的影響，主要也是在過去的歷史上，什葉派宗教領袖基本上是不主動介入政治，而一旦介入常常就是反映危機的發生，因此伊拉克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也不與納迦夫的宗教領袖們衝突，因此，希斯塔尼可以扮演角色，並賦予更多相對溫和的政治領導人更多的力量，免於其他政治人物用暴力與利益的威逼（Alaaldin, 2018）。

最後，本文將從前文所討論過的建制、過程與結果層面，綜合討論以上案例中的主要衝突形式與結果（如表 1）。首先在中央政府的案例上，由於主要的衝突形式包括：(1) 貪腐與治理的問題；(2) 宗派與種族的差異以及 (3) 內閣的職位之爭。如同 Ranj Allaaldin (2019) 所說的，伊拉克人已經受夠了長期公共服務的低劣、政府的失敗與貪腐的問題，2019 年 10 月的抗爭已經造成至少數百人死亡、2 萬多人受傷的惡劣情勢，也導致馬赫迪總理的黯然下台。不過，從本文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在組閣的過程中，基本上仍遵守的權力分享的制度，致力於避免遜尼派感到被邊緣化，並試圖與庫德族保持良好關係，因此相關的內閣職位也得到妥協性的安排。但很明顯的，抗議民眾仍不滿意僅僅只有總理下台的改革，甚至國會的最大黨

[42] 週五談話的內容均有英文展示（Al-Bayancenter for Planning and Studies, 2020），本文則經過文字雲的處理得出談話主軸。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本研究的相關案例與衝突韌性分析

案　例	中央政府（巴格達）	庫德自治區（艾比爾）	阿巴音節與宗派主義（卡爾巴拉）
衝突形式	・貪腐、經濟與公共服務低落 ・宗派、種族差異 ・內閣職位之爭	・獨立公投後與中央的衝突 ・政黨間的衝突 ・貪腐與政府失能問題	・暴力攻擊
建制面	・*Muhasasa taifa* ・民兵	・制裁促成讓步 ・權力分享機制促成職位的分配	・宗教領導的影響 ・協力治理 ・外來勢力（伊朗）的介入（協助）
過程面	・無法避免宗派式意識形態 ・追逐職位與恩庇制度仍難避免。	・雖有宗派與種族意識形態，但效果有限	・避免宗派式意識形態 ・強化國族的認同
結果面	・成功組閣 ・權力分享機制維持 ・仍無法解決治理問題	・權力分享，順利形成內閣 ・與中央暫時妥協 ・仍無法解決貪腐與恩庇等問題	・歷年來暴力犯罪下降 ・仍有激進遜尼派（如 IS 成員暴力攻擊的隱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領袖薩德爾，也遭受抗爭民眾的反對，若無法回應民眾的想法，也無法解決伊拉克的困境，但本文認爲，在既得利益的基礎上，恐怕短期內的衝突解決方式仍得靠權力分享的方式，以維繫「伊拉克這個國家」，不然，極有可能走向不同種族、宗派等分崩離析的局面。甚至什葉派內部的衝突因子也仍存在，比方說巴斯拉省又再次要求自治的問題，也會成爲未來伊拉克衝突是否能夠有效解決的潛在因子。儘管過去希斯塔尼曾經公然反對此一主張，認爲巴斯拉的自治將可能會導致國家的分裂，但是這次卻相對沈默（Duman, 2019），而一旦巴斯拉自治，則石油的分配、基爾庫克的問題或其他遜尼派爲主的省份，如提克里特市（Tirkrit）與安巴爾省，有可能都會要求自治，將會是未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庫區政府的案例上，如前所述，由於主要的利益（如石油與機場）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上，在利益的需求與相關周邊國家的強烈反對情況下，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庫區的政治菁英短時間不會採取獨立的主張。但是，基爾庫克的問題與石油收益分配的問題，仍會是中央政府與庫區政府持續衝突的部分，尤其目前庫區形成「庫德族聯盟」，就是希望能團結庫區勢力以收回在基爾庫克的利益。

而在內部的衝突上，庫區政黨之間雖有歷史上的對抗，但目前的權力分享機制大致上讓不同的政黨與宗派之間達到滿意且平衡的狀態，因此，此一機制應可持續維繫良好，以本次選舉來看，雖然 KDP 大可與其他小黨自組聯盟政府，但是最後仍選擇與 PUK 分配職位，足見此機制已經產生足夠的韌性。但是庫區的貪腐與治理問題，仍會是未來持續衝突的主因，同時，庫區也牽動著包括美、俄、伊朗、土耳其等國在此一區域的利益，加上伊斯蘭國殘餘份子的潛在威脅，距離和平仍有許多問題。由於 KDP 仍是主要的影響政黨，因此，巴爾扎尼家族如何解決衝突，亦是主要的因素。

最後，在宗派主義上，如同上述分析，由於宗派常常在危機的時候才介入，因此相關政治人物也不吝於給予宗派領袖一定的地位。而以阿巴音節爲例，更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與宗派領袖、地方團體，甚至是伊朗的志願團體之間的協力合作，若沒有伊斯蘭國殘餘份子的威脅，應可在既有的架構下持續維繫和平。同時，宗派領袖對於伊拉克國族的強調，也可以避免伊拉克走向分崩離析的狀況，加上馬赫迪政府積極與遜尼派維持良好的關係，宗派主義雖然會被激進的恐怖主義份子藉由汽車炸彈等攻擊，試圖挑起如同 2003 年之後的對抗關係，但本文認爲並不容易，反而是什葉派之間的對抗與治理的結果，才是衝突的根源。

陸、結論

本文從不同的案例探討伊拉克的和平韌性，並發現雖然伊拉克目前的衝突情勢仍舊持續升高，但是不同案例之間仍有其解決衝突的方式。在上述案例中，以阿巴音節「由下而上」的治理案例較爲成功。其成功的因素當然一方面是宗教不同於政治，且宗教社群發揮主要的影響力，雖然說從相關的資料與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宗派主義並非如此壁壘分明，反倒是因爲派閥結合宗教的部族（tribes）或民兵團體才是主要的衝突根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宗教社群的影響力仍會是未來影響伊拉克和平的主要因素，特別是宗教領袖如希斯塔尼的相關談話，對於支持者來說也會具有重要影響，但隱憂是希斯塔尼的年事已高，未來將由誰來扮演此一角色，是較大的危機。

政治人物間的衝突則因牽涉太多的利益，而只願接受權力分享的機制，形式上尊重不同部族之間的妥協。但在中央政府組閣的過程中，什葉派領袖們其實並非眞心的想要做到與庫德族或遜尼派的的分享，因此有許多政治人物因此主張「多數統治」，加上政治的腐敗與民眾失去耐心，透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僅能做出在政治的領導菁英上已有一定的協調機制與解決衝突的韌性，其實就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對於根本上的衝突與韌性的機制，仍然缺乏，也是政治菁英與民意落差所在。

未來伊拉克的衝突仍會出現在經濟、治理與恩庇制度上。伊拉克政府的資金 85% 來自於石油的收益，而 70% 的政府預算卻是用在人事經費上，但如同世界銀行統計的，每位公務員每天的生產力卻僅僅只有 17 分鐘（Allaaldin, 2019）。另外，因爲權力分享機制，傳統的部族對於取得政府職位甚至是其他職位都有很大的影響力，而這些部族也會決定他們要支持哪個政黨，因此造成每個地區的情況都不一樣，難以有統一的模式與解決之道，以庫區爲例，達霍克（Duhok）有 90% 的部族支持 KDP，但是在艾比爾則較爲平均，可是若是在第二大城蘇萊曼尼亞則多半是支持 PUK 與 *Gorran* (Qader & Hakeem, 2018: 7-8)，因此，以整體伊拉克作爲案例分析，未來權力分享的治理機制仍會持續存在，但是也正因爲此權力分享機制導致了職位分贓與恩庇制度的持續，雖然此次內閣的組成強調專業與技術官僚，但是否能夠改變衝突的根源，進而形成韌性，仍令人質疑。

不過，我們也觀察到伊拉克國族認同的情感，隨著周邊行爲者的干預，有日趨穩定的現象。以 2019 年 10 月爆發的大規模抗爭行動來看，示威者除了對於政治經濟情況與馬赫迪總理執政的不滿外，更大喊「伊朗出去」（Iran out）與「伊拉克自由」（Free Iraq）等口號（Telci, 2019），雖然在政府直接關閉全國網路，以阻止抗議者透過社群媒體組織抗議，同時在政府軍隊的介入下，抗爭已有緩和，但是這些問題仍會持續影響著伊拉克政治。而在筆者訪談與接觸中，由於受訪者多爲政治菁英，均認爲將希望寄託給年輕人，之後就會轉變，但許多阿拉伯裔的民眾卻如前文所述的遜尼派，

臺灣大學圖書館

仍擁有對繁榮過去的回憶，是否有可能走回強人政治的統治，也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總而言之，和平建立本來就不是易事，仍須未來在研究上逐步透過在地化的過程，分析不同國家、地區與形式，以探討不同解決衝突的方式，本文爲一初步嘗試，企圖跳除原本制度面的成敗，而從領導與社群面探索衝突的根源與其解決之道，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尤待後續的研究與更多的案例加以補足。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王順文，2018，〈美國主導伊拉克「聯盟臨時行政當局」的策略與成效分析〉，《政治科學論叢》，77: 141-178。Wang, Shun-wen. 2018. “Meiguo zhudao yilake lianmeng linshi xingzheng dangju de celuyu chengxiao fenxi” [An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US Intervention in Iraq and Its Leadership of 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7: 141-178.

李宗勳，2015，〈災防的韌性治理與風險分擔之關聯及實證調查〉，《中央警察大學警察行政管理學報》，11: 1-20。Li, Tzung-shiun. 2018. “Zaifang de renxing zhili yu fengxian fendan zhi guanlian ji shizheng diaocha” [The Relevance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Resilience Governance and Risk Taking]. *Journal of Police Management* 11: 1-20.

李宗勳，2017，〈社區協力策略在大量傷患事件緊急救護的系統韌性〉，《中央警察大學警察行政管理學報》，13: 91-117。Li, Tzung-shiun. 2017. “Shequ xieli celue zai daliang shanghuan shijian jinji jiuhu de xitong renxing” [System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strategy on Mass Casualty Incident emergency rescue]. *Journal of Police Management* 13: 91-117.

汪　波，2007，《美國中東戰略下的伊拉克戰爭與重建》，北京：時事出版社。Wang, Bo. 2007. *Meiguo zhongdong zhanlue xia de yilake zhanzheng yu chongjian* [*Iraq War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Under US Middle East Strategy*].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林佾靜，2008，〈失敗國家與國家安全：衝擊與回應〉，《全球政治評論》，2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121-159。Lin, Yi-ching. 2008. “Shibai guojia yu guojia anquan: chongji yu huiying” [Failed Stat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act and Response.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24: 123-159.

林佾靜，2009，〈聯合國與建立和平：以獅子山共和國爲例〉，《國際關係學報》，27: 117-160。Lin, Yi-ching. 2009. “Lianheguo yu jianli heping: yi shizishan gongheguo wei li” [UN and Peacebuilding: The Case of Sierra Leone].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 117-160.

陳淳文，2017，〈釋憲趨勢與半總統制的制度韌性〉，《政治科學論叢》，72:1-56。Chen, Chwen-wen. 2017. “Shixian qushi yu banzongtongzhi de zhidu renxing”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of Taiwanese Semi-Presidential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2: 1-56.

黃泰霖，2012，〈系統韌性概念回顧與災防策略之省思〉，《災害防救電子報》網頁，http://www.ncdr.nat.gov.tw/upload/epaper/088.pdf，2020/3/30。Huang, Tai-lin. 2012. “Xitong renxing gainian huigu yu zaifang celue zhi xingsi” [Review of System Resilienc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Strategy]. in http://www.ncdr.nat.gov.tw/upload/epaper/088.pdf. Latest update 30 March 2020.

鄭慧慈，2008，《伊拉克史：兩河流域的榮與辱》，臺北：三民。Cheng, Huei-tsz. 2008. *Yilakeshi: lianghe liuyu de rong yu ru* [*History of Iraq*]. Taipei: Sanmin.

聯合國，2018，〈建設和平與保持和平(A/72/707–S/2018/43)〉，聯合國網頁，https://undocs.org/zh/a/72/707, 2020/3/30. United Nations. 2018. “Jianshe heping yu baochi heping (A/72/707-S/2018/43)” [Peacebuilding and Sustaining Peace (A/72/707-S/2018/43)]. in https://undocs.org/en/a/72/707. Latest update 30 March 2020.

聯合國，2020，〈聯合國建設和平〉，聯合國網頁，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zh. United Nations, 2020/3/30. United Nations.2020. “Lianheguo jianshe heping” [United Nations Peacebuilding]. in https://www.un.org/peacebuilding/zh. Latest update 30 March 2020.

二、西文書目

Alaadin, R. 2017. *Fragility and Resilience in Iraq (Working Papers 17/33, November 2017)*. Roma: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Alaadin, R. 2018. “Iraq’s Nex War. Rival Shiite Factions Could Be Headed Toward Disaster.” 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8-09-13/iraqs-next-war.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aadin, R. 2019. “How to Solve Iraq’s Problems. PM Adel Abdul Mahdi Can’t Meet Demands of Iraqi Protesters without Fixing the Economy.” in https://gulfnews.com/opinion/op-eds/how-to-solve-iraqs-problems-1.67009090.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 Arabiya English. 2019. “Sistani tells Rouhani: Arms must be Limit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in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middle-east/2019/03/13/Sistani-tells-Rouhani-Arms-must-be-limited-to-the-state-and-its-institutions.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aca, M. 2019. *Election of Nechirvan Barzani as The President of KRG and Its Implications*. Ankara: ORSAM.

Albawaba. 2018. “New Iraqi Premier Abdul Mahdi Receive Support of Top Shiite Clerics.” in https://www.albawaba.com/news/new-iraqi-premier-abdul-mahdi-recieves-support-top-shiite-clerics-1197956.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Bayan Center for Planning and Studies. 2020. “Friday Prayer’s.” in http://www.bayancenter.org/en/category/publications/friday-prayers/. Latest update 30 March. 2020.

Aldroubi, M. 2018a. “Baghdad Faces Renewed Protests in Southern Iraq. Residents of Oil Hub Threaten Demonstrations if Demands for Services are not Met.”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q-politics-sunnis/sunni-group-pulls-out-of-iraqi-government-talks-idUSKCN1MY1W6.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droubi, M. 2018b. “Kurdish PUK Party Says It Will Not Recognize Election Results.” in https://www.thenational.ae/world/mena/kurdish-puk-party-says-it-will-not-recognise-election-results-1.775376.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jazeera. 2018. “Anger Is Simmering among Iraq’s Kurdish Youth.” in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anger-simmering-iraq-kurdish-youth-181111215952044.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l-Marashi, I. 2019. “Breaking Badr: Iraq’s Divisive Shia Politics.” in https://www.trtworld.com/opinion/breaking-badr-iraq-s-divisive-shia-politics-24768.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Arab News. 2019. “Iraqi Kurdistan Gets New Cabinet, Without Oil Minister.” in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523696/middle-east.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Bar’el, Z. 2017. “Kurdistan’s at a Breaking Point, but Will It Be a ‘Kurdish Spring’ or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Civil War?" in https://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 iraq/.premium-1.830983.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Barma, N. H., N. Levy, & J. Piombo. 2017. "Disentangling Aid Dynamics in Statebuilding and Peacebuilding: A Caus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4(2): 187-211.

Barzani, M. 2018. "A Statement of Barzani on the Nomination Process for the President of Iraq." in https://www.masoudbarzani.krd/en/news-and-press-releases/a-statement-from-barzani-on-the-nomination-process-for-the-president-of-iraq/.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BBC. 2013. "Iraqi Sunnis Stage Protes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0914273.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Bengio, O. 2018. "The Shi'i Revolution in Iraq: A Retrospective." in https://dayan.org/file-download/download/public/16434.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Brainbridge, W. S. 1989. *Survey Research: A Computer-Assistant Introduction*. Belmont: Wadsworth.

Carpenter, A. C. 2012. "Havens in a Firestorm: Perspectives from Baghdad on Resilience to Sectarian Violence." *Civil Wars* 14(2): 182-204.

Carpenter, A. C. 2014.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Sectarian Violence in Baghdad.* New York: Springer.

Chilcot, J. 2017. "Chilcot Report."in http://www.iraqinquiry.org.uk/thereport/.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Chomani, K. 2017. "Baghdad Seeks Concessions before Negotiating with Kurds." in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2/baghdad-erbil-negotiations-iraq-kurdistan.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Christia, F., E. Dekeyser, & D. Knox. 2016. "To Karbala: Surveying Religious Shi'a from Iran and Iraq. MIT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Research Paper No. 2016-39."in https://ssrn.com/abstract=288534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885347.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CIA. 2019. "The World Factbook: Iraq." in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iz.html#Govt.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Cockburn, P. 2019. "People are Dying: The Shia City Where ISIS are Trying to Make Their Presence Known." in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iraq-isis-bombing-attacks-karbala-shrine-shia-city-a9123801.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臺灣人學期刊資料庫

De Coning, C. 2016. “From Peacebuilding to Sustaining Peace: Implications of Complexity fo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Resilience* 4(3): 166-181.

Dagheer, S. 2009. “Devotion and Money Tie Iranians to Iraqi City.” in https://www.nytimes.com/2009/05/31/world/middleeast/31karbala.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Dobbins, J., S. G. Jones, B. Runkle, & S. Mohandas. 2009. *Occupying Iraq A History of 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Pittsburgh: Rand Corporation.

Dodge, T. 2003. *Inventing Iraq: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and a History Denied*.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dge, T. 2018. “Is There Hope for Reform in Post-Election Iraq? New Leaders Will Have Trouble Confronting the Corrupt Powers That Chose Them.” 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q/2018-10-17/there-hope-reform-post-election-iraq.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Dri, K. F. 2019. “Kurdish Parties Announce ‘Kurdistani Coalisiton’ for 2020 Local Election in Disputed Areas.” in https://www.rudaw.net/english/culture/28092019.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Duman, B. 2018. *2018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The KRG.* Ankara: ORSAM.

Duman, B. 2019. “A Difficult Test for The Iraqi Government: Discussions Over Federal Region in Basra.” in https://www.orsam.org.tr/en/a-difficult-test-for-the-iraqi-government-discussions-over-federal-region-in-basra/.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Ejdus, F. & A. E. Juncos. 2018. “Reclaiming the Local in EU Peacebuilding: Effectiveness, Ownership, and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9(1): 4-27.

Engdahl, F. W. 2017. “Moscow Outmaneuvers Washington’s Kurdistan Project.” in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moscow-outmaneuvers-washingtons-kurdistan-project/5616707.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Gisselquist, R. M. 2015. “Good Aid Hard Places: Learning from ‘Successful’ Interventions in Fragile Situ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2(4): 283-301.

Glob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2020. “Hashd al-Shaabi/Hashd Shaabi/Popular Mobilisation Units/People’s Mobilization Forces.” i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hashd-al-shaabi.htm.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Goran, B. 2018. “Masoud Barzani: People of Kurdistan Have Legitimate Cause.” in https://www.kurdistan24.net/en/news/6c0c394c-2bdf-42ef-a179-e750e082f709.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Guttieri, K. & J. Piombo, eds. 2007. *Interim Governments. Institutional Bridges to Peace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Habib, M. 2018. "Real Democracy? Iraqi Politicians Debate Changing System That Kept Parliament Peace for Years." in https://www.niqash.org/en/articles/politics/5870/.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Haddad, F. 2017. "Sectarian Relations before 'Sectarianization' in pre-2003 Iraq." In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eds. Nader Hashemi & Danny Postel.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1-122.

Hamoudi, H. 2009. "Navigating the Najaf Mantra with the Four Grand Ayatollahs." in http://mallat.com/sites/default/files/Hamoudi5Nov09.pdf.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Hannah, J. 2020. "Iraq Needs Regime Change Again. Foreign Policy."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20/iraq-needs-regime-change-again-allawi-protests-iran/. Latest update 20 February 2020.

Hashemi, N. & D. Postel. 2017.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cos, A. E. 2018. "Resilience in Peacebuilding: Constesting Uncertainty, Ambiguity, and Complexity."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9(4): 559-574.

Iraq Oil Report. 2019. "Baghdad Hikes Monthly Payment to Kurdistan." in https://www.iraqoilreport.com/news/baghdad-hikes-monthly-payment-to-kurdistan-38061/.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Jazaeri, I. 2017. "Political Parties Eye Kurdish Vote Ahead of Iraqi Elections." in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features/2017/12/27/Political-parties-eye-Kurdish-vote-ahead-of-Iraqi-elections.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Karbala Center for Studies and Research. 2018. *2018 International Arbaeen Conference Book.* Karbala: KCSR.

Kingdon, J. W. 2003. *Agendas, Alternative, and Public Policies.* New York: Longman.

Knights, M. 2010. "The Evolution of Iran's Special Groups in Iraq." *CTS Sentinel* 3(11): 12-15.

Krasner, S. D. & T. Risse. 2014. "External Actors, State-Building, and Service Provision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 Introduction." *Governance* 27(4): 545-5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ndborg, N. 2017. “To Stabilize Iraq After ISIS, Try a Method That Worked, USIP.” In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7/06/stabilize-iraq-after-isis-try-method-worked.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Lonergan, K. 2017. *Does Reconciliation Prevent Future Atrocities? Evaluating Practice in Sri Lank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gid, P. 2020. “In death Suleimani May Achieve His Life’s Dream: Preserving Iranina Power in Iraq.”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1/07/death-qassem-suleimani-achieve-life-dream-unite-iraqis-anti-us-protests/.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Maley, W. 2013. “The ‘Americanization’ of Democratic Theory.” In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n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From Bush to Obama*, eds. Akbarzadeh, Shahram, Benjamin Mac Queen, James Piscatori, & Amin Saik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7-44.

McCarthy, R. 2004. “Iraqi Portesters Demand Election as Ayatollah Threatens Fatwa.” 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4/jan/16/iraq.rorymccarthy. Latest update 20 December 2017.

Middle East Monitor. 2018. “Iraq’s Sadr Calls on Kurds to Abandon ‘Quotas’.” in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81016-iraqs-sadr-calls-on-kurds-to-abandon-quotas/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Mironova, V. & M. Hussein. 2018. “Islamic State Fighters Are Back, and This Time They’re Taking Up Arms With Shiite Militias.” 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0/15/islamic-state-fighters-are-back-and-this-time-theyre-taking-up-arms-with-shiite-militias/.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Mirzaei, A. 2017. “Game Over: How the Kurds Lost the High Risk Gamble.” in https://thesaker.is/game-over-how-the-kurds-lost-the-high-risk-gamble/.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Nawzsd, K. 2019. “Lingering Party Disputes Continue to Stall New Kurdistan Government.” in https://www.kurdistan24.net/en/news/ceff1575-2334-46ad-8639-6d1d97e6efc4.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Nazemroaya, M. D. 2006. “Plans for Redrawing the Middle East: The Project for a ‘New Middle East’.” in https://www.globalresearch. ca/plans-for-redrawing-the-middle-east-the-project-for-a-new-middle-east/3882.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Nazir, M. 2006. “Democracy, Islam and Insurgency in Iraq.” *Pakistan Horizon* 59(3): 47-65.

Peçanha, S. 2017. “How the Kurdish Quest for Independence in Iraq Backfired.” in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11/05/world/middleeast/kurd-independence-iraq-turkey-iran-syria-maps-backfired.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Peterson, S. 2017. "Why Shiite Pilgrimage to Karbala Had Special Meaning this Year." in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7/1114/Why-Shiite-pilgrimage-to-Karbala-had-special-meaning-this-year.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Qader, S. S. & H. I. Hakeem. 2018. *The Role of Tribes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KRG*. Ankara: ORSAM.

Rabkin, N. 2014. "The Iraqi Shiite Challenge to Tehran's Mullahs." in https://www.meforum.org/3682/iraqi-shiite-challenge-iran.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Rodgers, W. 2019. "Kurdistan Region Stalls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19/03/kurdistan-region-stalls-government/.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Reuters. 2018. "Sunni Group Pulls Out of Iraqi Government Talks."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q-politics-sunnis/sunni-group-pulls-out-of-iraqi-government-talks-idUSKCN1MY1W6.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Rohwerder, B. 2014. *Contemporary Conflict Analysis of Iraq (Rapid literature Review)*.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Rudaw. 2018a. "Shiite Arab families ordered to settle in Kurdish village in Kirkuk." in https://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01112018.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Rudaw. 2018b. "Sunni-Shiite Dispute to Delay Appointment of Iraq Ministers." in https://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iraq/051120184.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Saadoun, M. 2017. "Iraqi Authorities Clamp Down on Sectarian Hate Speech." in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1/shiite-arbaeen-pilgrimage-sunni-figures.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Sayah, R. 2017. "Does Iran's Deep Religious Influence in Iraq Translate to Politics?" in https://pulitzercenter.org/reporting/does-irans-deep-religious-influence-iraq-translate-politics.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SIGIR. 2013. "Learning from Iraq. A Final Report from the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i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2013/sigir-learning-from-iraq.pdf.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rasser, F. 2017. “How to Foster Peace in Iraq After ISIS, USIP.” in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7/02/how-foster-peace-iraq-after-isis.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Telci, I. N. 2019. “Iraqi Youth No Longer Tolerate Iranian Influence and State Corruption.” in https://www.orsam.org.tr/en/iraqi-youth-no-longer-tolerate-iranian-influence-and-state-corruption/.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The Baghdad Post. 2019. “Who are Abd al-Mahdi’s New Ministers of Defense, Interior, Justice?” in https://www.thebaghdadpost.com/en/Story/42057/Who-are-Abd-al-Mahdi-s-new-ministers-of-defense-interior-justice.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The Telegraph. 2011. “15 Killed on Iraq ‘Day of Rage’.” in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q/8348771/15-killed-on-Iraq-Day-of-Rage.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Väyrynen, R. 1997. “ Towards Effective Conflict Prevention: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Instruments.” in http://www.gmu.edu/programs/icar/ijps/vol2_1/vayrynen.htm.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Yildiz, K. 2012. *The Future of Kurdistan. The Iraqi Dilemma*. New York: Pluto Press.

Zeed, A. A. 2020. “Who are Sadr’s Blue Hats in Iraq and what side are they on?” in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2/muqtada-sadr-iraq-blu-hats.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alysis on Conflict Resilience in Iraq:

The 2018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Sectarianism*

*Shun-wen Wang***

Abstract

Conflicts in Iraq are rooted in failures of governance, corruption, sectarianism and many other variables. This paper, however, focuses on the idea of "conflict resilience" which leads to an analysis of the depth of peace under the peace-building process in three major aspects: regimes, process capabilities and outcomes. This paper takes conflicts after Iraq'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nd the KRG'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s examples, and it also deals with the sectarian leaders' role for Iraqis and the security mechanism during the Arba'een pilgrimag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The roots of conflict in Iraq and a review of papers on "conflict resilience"; 2. Conflict resilience after the 2018 parliamentary election; 3. Conflict resilience after the 2017 KRG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nd the 2018 KRG parliamentary election; 4. Sectarianism and the Arba'een pilgrimage. Finally, it analyzes conflict resilience in Iraq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regime, process capabilities and outcomes in order to make a conclusion.

Keywords: Conflict Resilience, 2018 Iraq Parliamentary Election, Kurd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2018 KRG Parliamentary Election, Sectarianism, Arba'een Pilgrimage

---

* DOI:10.6166/TJPS.202003_(83).0002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wsw4@ulive.p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